

書叢藝文益羣

集火星

著 芳 其 何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書叢藝文益羣

集 火 星

著 芳 其 何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 1949 •

羣益文藝叢書

· 集 火 星 ·

刊行者：

著 者 何 其 芳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基本定價 六 元 一 角

經售者 聯 營 書 店

北京·上海·漢口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二〇〇弄三九號

羣益出版社

上海四川北路八五〇號

有版權·滬 1 (0001—3000) (36C15)

目 錄

第一輯

論工作·····	一
論本位文化·····	二一
論救救孩子·····	二五
論周作人事件·····	三三
關於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	二六
坐人力車有感·····	三四
論家族主義·····	三七

第二輯

某縣見聞·····	四一
川陝路上雜記·····	四九
我歌唱延安·····	五九
日本人的悲劇·····	六七
一個太原的小學生·····	七七
老百姓和軍隊·····	八七
七一五團在大青山·····	一〇四

第三輯

一個平常的故事·····	一一九
論快樂·····	一三七

論「土地之鹽」	一四五
高爾基紀念	一五一
鐵鉞	一五七
後記一	一六七
後記二	一七六

論工作

去年在一個縣裏的師範學校裏教書。有一次，學校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組織戰時後方服務團。這也好，我想，可以大家都做一點課外的工作了，不是教書的和讀書的都感到僅僅過課堂生活的苦悶嗎。於是我說出一點意見。我認爲這類工作應該以學生爲主體，我們教書的處一個參加或者補助的地位。至少應該在那服務團中的各組裏找一兩位學生來負一部份責任，比如名義就叫幹事之類。因爲我總相信學生們負起責任來自動的作才作得好的，而且在一個學校裏，學生究竟是主體呀。然而我像在真空裏說話一樣，沒有人注意，沒有人贊和，也沒有人說出我的意見爲什麼不行。

不過那服務團終於產生了：校長是團長，一部分教職員是各組組長，另外一部分剩下來的教職員是組員。學生也是組員，每人選擇加入一組。工作呢，且慢，還

要訓練，還要四個禮拜的訓練。

誰來訓練呢，仍然是教職員，不過在正課之外增加了幾點鐘而已。受訓練的不用說仍然是學生。大概人們都相信教國文的就是在一定認識幾個字，而認識幾個字的就一定會宣傳吧，我被派為宣傳組的組員，並且被通知要去訓練另外的組員了。我只去上了一點鐘這種古怪的訓練，以後就不遵命了。我的「訓練」是這樣開頭的：

「今天我想隨便和同學們談幾句話。依照學校的規定，這叫做訓練，不過依照事實，這仍是隨便談談。因為說到訓練，恐怕應該我來受同學們的訓練。因為我幾乎從來沒有作過宣傳工作。不過學校奉命組織戰時後方服務團，我們也就得來奉命訓練，而且同學們將來還得出去奉命宣傳。在我們國家裏，凡是奉命而作的工作總是常常作不好的。我們的敵人曾經嘲笑過我們的國家為『文字之國』。現在我回到四川來更有一點感想，似乎敵人的刻薄話還不够刻薄，還可以改作『公文之國』。我們只看見公文來，公文去，旁的文字倒少看見的。不過我仍然希望同學們借這個機會認真作一點工作，不要想着是『奉命』，要當着是自動的起來作一樣。並且我

希望同學們在四個禮拜之後，從實際的工作的經驗裏去得到訓練。那才是有益的訓練。那才是真正的訓練……」

四個禮拜是很快就過去了。旁人訓練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訓練了四個禮拜之後就完了，什麼都完了。就是說以後並沒有做什麼工作。這卻是我所沒有意料到的。

由上面來的這樣那樣的命令仍是沒有完的來，有些要學校作一點事才能回報，有些就僅僅需要一封公文。有一次，又奉到命令了，要教職員們出去作三天「徵兵保國」的宣傳。學校當局考慮的結果，打一個折扣，改成一天半，在一個禮拜天的上午舉行。這一次我沒有去。我想我也可以把它打一個折扣，打成完全不作。因為第一，我感到自己不能去向那些鄉場上的農人說，「你們去當兵吧，去死吧，好讓我們在後方當專聘教員」。第二，我懷疑那種站在茶館裏的板凳上，或者站在比板凳更高的棹子上的演講式的宣傳收得到多少效果。

這一類的後方工作情形使我有點兒不滿。

在我自己，覺得比較可以表出我當時的那種心境的就是這字眼，不滿，然而旁人卻開玩笑似的稱我爲「悲觀論者」了。他們的意思彷彿說，「你這樣也不滿，那樣也不滿，不是悲觀是什麼？」他們的態度，他們認爲比較正確的態度大概是這樣：國家的情形現在是不很好的，但一定會好起來；前方現在是當然要打敗仗的，但將來會打勝仗；後方現在是當然有很多的毛病的，但我們也無法盡力，因爲受着環境的限制。對於國家的將來和抗戰的前途我同樣的並不悲觀，不過，我們和他的意見的分歧點在這裏：我認爲這將來這前途是要通過一個巨大的或者還是長長的苦難的，並不是像說說好聽的話那樣容易。同時這苦難，我們智識份子應該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同背負起來。就是說應該極力的做着直接或間接對於抗戰有利的工作，無論在前方，在後方。只是這樣也不滿，那樣也不滿，而不做這種工作的是不行的；只是說着「最後勝利必屬我們」，而坐在旁邊，不伸出他的白淨的手來做這種工作的也同樣要不得。

我苦悶。我對自己也不滿。我似乎就屬於那第一種不行的人。但苦悶，不滿，

無論對於環境或自己，都是好的。再進一步便是認真的工作。

這時候前線的消息是繼續傳來：太原失陷，上海失陷，南京失陷。這時候笑我爲「悲觀論者」的人們變得悲觀起來了，對於抗戰的信心起了動搖。這時候輪到我說話了。我說，「當你們都悲觀起來的時候我卻變成一個樂觀論者了。」這不僅是一句開玩笑的話而已，我的意思是當大家都覺悟到坐着等最後勝利是不可靠的以後，或者大家都會再進一步來作一些對抗戰有利的工作了。

然而我仍是常常聽見這樣的抱怨：受着環境的限制。

客觀的存在着的環境的限制是不能抹殺的。不過工作有着許多的種類，許多的作法，這唯一的理由是不够作爲懶惰，苟安，以及東方式的個人主義之類的辯解的，因爲被石頭壓着的樹子也還可以生長。現在我更想起了最近來成都後一位朋友的話，「工作沒有地域性」。這是他的一篇未寫的文章的題目。在原則上，這句話的含義我是贊同的。不過，他倒不是針對着那些有能力做工作而不做的人們而說，他是打算談論一下最近一半年來青年們到陝北去的問題。他並且附帶的提及，他知

道有一個失戀的人也要到陝北去。在這裏我不能不提出我的異議了。就我所知（我所知的事實自然是很有限制的），到陝北去的多半是準備去受訓練的，他們多半認為普通的學校負不起訓練他們的責任，或者那種普通的訓練不合乎他們目前的需要，因此毅然到另外一個環境去進學校，沒有什麼可非難的。至於他們是在失業之後，或者失學之後，或者失戀之後才去，還是在什麼也沒有失之前就去，都不必追問。就比如說那個失戀的人吧，他因為失戀而到陝北去，不比因為失戀而自殺，而頹廢，而胡塗下去強得多嗎？

同時我們這些自以為不必或不願受什麼訓練的人也應該問一問自己了：到底我們做過了一些什麼，正在做些什麼，和打算做什麼。

或者把「我們」的範圍更縮小一些吧，讓它僅僅指着平常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一個先決的問題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現在放不放棄文學工作？其次，假若不放棄的話，我們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依我個人的意見，假若我們有機會有能力去做更切實，更有效，更有利於抗戰

的事情，放棄文學工作並不是可惋惜的。我們不至於那樣狂妄，自以為我們這民族的未來的偉大文學作品一定將在我們的手裏產生。相反的，我們相信脫離了人生，脫離了時代，脫離了為這民族的自由而戰鬪，而死傷，而受着苦難的羣衆，無論任何形式的文學作品都不會偉大起來。我們更不至於那樣喪心病狂，抱着亡國士大夫的見解，如一個叫做「文化新聞」的小刊物所載的武漢大學的某教授對學生們所說的話，「你們還是安心讀書吧，亡了國後你們還可以當太戈爾」；相反的；我們願意用一萬個太戈爾換取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國家。

不過，同樣的依我個人的意見，我們的手裏還沒有另外的武器來代替之前，我們仍然不必放棄文學工作。我們應該更勤苦更熱情的負起抗戰中的文學工作的責任。這裏就有着一個態度問題了。在戰爭中，文學工作者有兩種顯明的不同的態度：熱烈的關心着戰爭，關心着在戰爭中的人羣，而且盡量的為時代盡他個人的力；或者仍然閉着眼睛，裝着耳聾，繼續從事他自以為是不朽的藝術的創作。前者可以舉羅曼·羅蘭來說明。雖然他大聲喊着「超乎混亂之上」，雖然他寄寓在瑞

士，他仍然與當時的戰爭和在戰爭中的人羣發生着密切的關係，他不但不斷的寫着許多勇敢的反對那種「不義的戰爭」的文章，而且不斷的和前方後方的人們通着信。自然，歐洲大戰與我們這次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兩種截然性質不同的戰爭，我們對這兩種戰爭本身的態度也截然不同。不過，在工作的態度上，在熱烈的關心着戰爭和在戰爭中的人羣，而且企圖竭個人的力量以貢獻於時代這一點上，仍然是一樣的。後者也可以舉一個代表。這要感謝梁宗岱先生，全靠他一篇評傳我才知道在那有着羅曼·羅蘭的法蘭西也有着一個象徵主義派的最後的詩人，保羅·梵樂希。歐戰當中，他在一個政府機關裏當職員，寫着他那五百餘行的長詩，「年青的命運女神」。而且據說那長詩出版後有一個批評家寫道，「我國近來產出了一樁比歐戰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羅·梵樂希的『年青的命運女神』」。在這裏，我並不想攻擊梵樂希，只是我要說那位批評家假若不是像一個僅僅讀過一年高中的十九歲的孩子那樣無知，就是無恥。歐洲大戰中死傷了三千萬人，三千萬活生生的人，不說五百行長詩，就是五千萬行長詩也不能相提並論。只是說漂亮話是不行的。

然而我那時僅僅讀過一年高中，讀過一月多的大學，而又在失學期中。梁宗岱先生那篇評傳是我對於法國象徵主義派的作品入迷的第一個階梯。我那時是非常可笑的，並不能直接讀法文的書籍而竟對法國的文學那樣傾心。

那時是什麼時候呢？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接着是熱河失陷，榆關失陷。然而我正做着「一些美麗的遼遠的夢」，明白點說，就是胡塗的過着日子。直到大學二年級，直到塘沽協定之前的那一度華北局勢緊張，何應欽將軍準備背城一戰，因而各學校通知學生離校，因而我也離開北平的頭一天晚上，我還在一個小公寓裏寫着「畫夢錄」裏的那一篇「黃昏」：

馬蹄聲，孤獨又憂鬱地，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

現在提起這些來我是非常感到羞恥的。然而有什麼辦法呢，那時並沒有一個朋友痛痛的罵我一頓，而我所讀的又全是那類書籍？

所以說到工作，無論或大或小，影響總是有。所以我們不能不慎重。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成都

論本位文化

三月十二日「新新新聞」上載有某先生在重慶沙利文的餐後談話。首先說中國過去教育的缺點由於喪失自信力；最後的結論是重新建設中國的固有文化；中間還談到中國是農業社會，父子兄弟一同勞作，不分階級，結果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唱婦隨，而歐美是工商業社會，以個人爲單位，致父子兄弟夫婦之關係疏淺，爲文化崩潰之始，因爲一切都不可靠，祇有我可靠，一切都不可愛，祇有錢可愛，結果遂產生個人自由與唯物史觀。

這使我想起了到成都後的第一夜，我睡在一個相別多年的舊同學的屋裏，談話談到很夜深，其間也就提到了本位文化，結果我害了一禮拜的傷風。

本位文化，或者固有文化，雖說它因持論者的不同而有各種的解釋，大概是指我國兩千年來在儒家思想籠罩之下的文化吧。關於非固有文化，特別是西洋文化，

我是準備不加評論的，因為我不大清楚，不過讀了一點簡單的世界歷史，一些外國小說。然而說到固有文化我卻是有意見的。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親身感受，我深蒙其賜。

在這裏，我只想說出我很久以來就感到我國的文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缺乏「人」的觀念。在我國的文化史上沒有相當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那樣一個時期，而且儒家思想是根本忽視着「個人」的。

我們這民族的悲劇是雙重的，一方面誠實的智識份子已和羅曼·羅蘭一樣深切的感到個人主義者的短處，軟弱無力，一方面不近人情的忽視着個人的儒家思想還是有力的存在着。儒家的倫理觀念總是對待的，尊卑，長幼，貴賤，在朝廷中不是君就是臣，在家庭中不是父就是子，不是兄就是弟，不是夫就是婦。人是一樣的，卻偏偏要分出高下。人的情感是一個，卻偏偏要分作許多種。這中間必然會產生虛偽和悲劇了。然而虛偽和悲劇是迂腐的儒生們所不注意的，歷代的統治者卻見到了這種分割人，分割情感的學說是很有用的，可以訓練順民。自唐以後真是一代不如

一代了，因為儒家思想的勢力越大起來，而又加上了宋朝的理學家們的那一套。元明清三代簡直就像一個「黑暗時期」。

現在我們不是希望着失陷區域的民衆起來反抗敵人和漢奸的統治嗎？不是又慨歎着民氣的消沉嗎？我們應該歸罪於一千多年來的專制政體之下的順民訓練。在自家人的訓練下成了順民，在敵人的統治下一定會仍然是順民的。

所以要提倡本位文化，或者固有文化，至少應該把它的缺點找出來，像對腐爛的瘡肉一樣割掉。

其實保存在真正的「農業社會」裏的文化又何嘗全是本位的呢。除了祖先崇拜，納妾，父母鞭打着孩子而又希望他將來長大了做官發財，兄弟爲遺產而打架而打官司，丈夫奴使着妻子，婆婆虐待着兒媳之類可以算做固有文化的純粹產品而外，所謂「農業社會」的思想多半來自道教，佛教。道教雖然比較原始，倒還是可以算做固有文化的，假若儒生們不爭正統的話。至於佛教卻實在沒有方法引爲我們這民族的光榮了，除了我們說總之它也是東方固有文化。

無論東方西方，人總是人，應該有着「人類的文化」。就是說在有些基本精神上各個民族的文化應該是相同的，假若有很大的不同，不是先進了一步就一定落後了。所以我不贊成籠統地提倡固有文化或本位文化。

三月二十七日

論救救孩子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魯迅先生已經這樣喊過了：「救救孩子……」

然而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常常聽見孩子的哭聲，大人的打罵聲。

不知旁人的感覺怎樣，我總認爲打罵孩子是人的很醜惡的行爲，因爲那是明明白白的欺負着不能還擊，不能自衛，甚至不能爲自己辯護的幼小者。至於以爲是自己所生的兒女，因此自己很有權力去折磨他們，更是卑劣的想法，雖說這想法有着悠久的倫理觀念和社會習慣爲它的基礎。

去年冬天，「新少年」要我爲它寫一篇文章，我很遲疑：我倒底寫一點什麼呢，爲那以高小和初中程度的孩子爲讀者的刊物？結果過了許久才寄出了一篇「私塾師」。我當時想，對於現在的孩子們過去的私塾生活是古怪得有趣的，而且他們知道了它，也許還是有益的，因爲他們會這樣對自己說，「感謝我們這時代，和過

去比較，我們幸福得多了。讓我們努力吧。」但我當時沒有想到雖說現在小學已普遍的設立，雖說小學教師已大都不鞭打他們了，孩子們還是逃不掉家庭裏的打罵的。長久生活在學校裏，我幾乎忘記了中國家庭裏的孩子們所受的待遇。

回到四川來我才常有機會坐在道地的中國家庭裏作客。每次當我坐在餐桌上，主人們或者主婦一面給我奉菜，勸菜，一面打罵着孩子，我就就心我要得消化不良症。

事實告訴我們孩子仍是大人發洩情感的對象。在這種社會裏大人們也多半是不幸的活着，忍受着。即使是不鬧「經濟恐慌」的家庭吧，大人們也會爲牙痛之類的小病，或者爲打牌輸了一筆錢，或者爲老爺受了上司的氣而太太又受了老爺的氣而打罵孩子的。至於窮苦的家庭更不用提了，大人們和孩子們都過着「非人的生活」。

這是常常使我充滿了一種混合着憤怒和難過的複雜情感的，當我走到一條街上，走到一個鄉村裏，總會看見一些穿着襤褸的衣服，有着黃瘦的污穢的身體，

在貧窮，疾病，營養不良和完全沒有教育之中生長着的孩子。我常常想這樣大聲的說：

「人們呵，你們不要再厚顏的誇耀着什麼我國人口衆多了吧。老鼠是比人更繁殖的。」

同時我想到很多的人就和老鼠一樣，在地上挖一個洞，或者不用比譬的說，在社會上佔一個棲身之處，然後討一個太太，生一些孩子，就完了。

我很奇怪人們爲什麼這樣短視，稍微遠一點的事就看不見，稍微複雜一點的事就看不清楚，並且爲什麼這樣健忘，自己長成大人了便忽視着，甚至虐待着孩子。

除了在家庭裏仍舊挨打挨罵之外，仔細分析起來，孩子們在學校裏也未必受着怎麼合理的教育。我所接近的是大一點的孩子，也許應該說是少年或者青年，而我藉以與他們接近的又是教着所謂國文，讓我就從這方面舉一些事實來說明吧。

去年九月我到某縣的一個師範學校去教三年級不同的班次，首先橫在我面前

的是教材問題。因為受了戰事的影響，教本無法買，只有自己編選。雖說我不懂什麼科學，我卻相信着科學和科學方法。我要有一個編選計畫。我相信那樣對學生有益一點。後來一個學生來找我閒談，他說有些「古文」他已經讀了五六遍；小學時先生選來教過的，初中一年級時先生又選來教，二年級或三年級換了先生時又選上了，翻來覆去是那幾篇。那學校的圖書館裏幾乎可以說沒有新文學書籍，而學校指定給他們的暑期讀物是「孟子」和「曾國藩家書」。

來到成都我更聽見一些奇聞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國文教本多半採用「經史百家雜鈔」或者「古文辭類纂」；考高中和大學都最好做文言，假若想考上；一些未來的小學教師，一個師範裏的學生們講究着認古字，做古文……

在這種風氣之下，我在一個中學裏教的一班高中畢業班竟大膽的自動的要求新文學，同時一班初二年級卻幾乎連學校規定的教本都不接受，因為他們說他們每人都有一部「古文觀止」。這些「古文觀止」的崇拜者做起文章來呢，有的說「直搗三島，生擒明治天皇」，有的說「意大利併合奧國後列強始有國際聯盟之組織」，

甚至一個很用功的文言比較通順的學生也說「我國三墳五典，經史百家，爲世界文學之淵源，泰西各科演變之基礎」，讀白話則「橫梗喉頭，若不可消化者」。他是一個瘦弱的規矩的孩子，不過十五六歲。

假若我們希望孩子們在精神上在身體上都健全的長成起來的話，不能不承認這種濃厚的復古空氣是有害的。在抗戰後的湖南，「全民周刊」某期告訴我們，何健將軍提倡的讀經教育的惡劣影響大大的暴露出來了，有些高中學生在受測驗的時候顯示了對時事的十分無知，而且承認最近一年多來沒有看過報。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以上不過是學校教育中的一個枝節問題。在民族解放戰爭正劇烈的進行着的現在，後方的青年們還有着更大的苦悶，更大的困難：他們渴望着一方面迅速的在精神上在知識上武裝起來，一方面直接的發揮出他們的力量以從事有利於抗戰的工作，而他們所受着的教育和訓練又不能滿足那種渴望。

這是一個整個的戰時教育問題，然而是有法解決的。事實上也有着比較適應抗戰時期的學校。不過，同樣也是事實，有一部分學校仍有着復古的傾向，或抱着形式主義，比如辦女學校的還主張着什麼三從四德，專門訓練着學生包被窩，用洋蠟擦地板，以博得參觀者或查學者一句讚語之類。

復古的風氣可以使孩子們的腦子麻木，只管表面好看的形式主義雖說可以欺騙胡塗人，在明眼人的面前是掩不住它的狐狸尾巴的。就在今年的兒童節，廣安的一個小學要學生們表演游擊戰，結果當場炸斷了一個女孩子的胳膊。炸斷胳膊是很慘的，大家都知道責備那小學的負責人。一個人的腦子比胳膊還重要，使人麻木的工作卻是暗暗的緩緩的進行，於是便為大家所不注意了。

我要重複的喊道：「救救孩子！」

然而我的聲音是十分細小的，即使達到了有些人的耳朵內也許還使他們不舒服，因為我這像蚊子一樣的聲音擾亂了他們的圓滿的復古夢，或者完成個人的富貴的成功夢，或者不過僅僅坐在牌桌子上的三翻夢。可不是嗎，我在一封友人寄來的

信上讀到這樣話了。

「……省師的教職員見着你在『工作』上寫的文章，很不滿，對學生指責你的錯處。但從你走了後，學生不要那繼任的教員，再聘一個雖接受了也不好。最近學生爲什麼事情挨了訓育一個耳巴，引起全體反對，四五天來都沒有解決。女中跑了幾個到陝北，從此女生出街就常有人跟着看管。某校跑得很多，其中亦跑了幾個。近來各校長都以學生不守規矩歸罪於受軍訓，說是那樣訓壞了的，因而一有了事就跑到縣府請示。某校請專員去斥退了十多個人，先不走，後來被軍隊嚇走。前頭召了個校長會議，議決對學生要嚴加管束，少加入什麼團體活動。如是而已……」

我簡直有點兒懷疑這些事的真實，因爲我才離開那裏兩個多月，想不到就鬧出了這樣多的花樣。然而信是明明白白的擺在我面前。事實是殘酷的。

四月二十八日清早。

論周作人事件

五月八日的成都報紙刊出了一條引人注意的新聞，有的標題是「周作人等竟附逆」，有的是「周作人做了漢奸」，有的還在標題下面加一個「？」號，彷彿不勝駭異。

事實是非常明白的：周作人的臉孔和談論出現在敵人在北平扮演出一幕醜劇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中，出現在大阪的「每日新聞」上，於是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向全國發出了一個驅逐周作人及錢稻孫等於文化界以外的通電。

錢稻孫教授是一個有名的親日份子，而且他的名字很早就出現在敵人的御用組織所謂「新民會」中。周則似乎是這一次才拋頭露面。即使是被拉下水，總之是下水了。在五月十一日的成都華西日報上，他的名字又出現在敵人的另一御用組織所謂「學制研究會」中，和着他的朋友徐祖正。後者並且是敵人的奴化教育系統之下

的「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

時代遺棄了那懶惰的胡塗的不願向着前面走的一羣，而這次的民族大抗戰更像紅色的火炬一樣照清楚了他們的藏匿在陰影裏的臉孔。

在比較多知道一點近幾年來文化界的情形的人，周之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並不是怎樣可駭異的。因為這不是偶然的失足，也不是奇突的變節，而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環境所造成的結果。他順着他的路走到了他的墳墓。

然而這條新聞到底還是引人注意的。一些十四五歲的孩子也問我，「爲什麼周作人做了漢奸？」由於很多人都是還沒有忘記他在五四運動前後對於新文學的貢獻，雖然未必如報紙上所說他還是什麼「新文學權威」，周到底是很知名的。而且由於他在「語絲時代」的積極態度，早一點在北平住過的人對於他也許還沒有完全喪失敬意。比如去年秋天，我風聞日本人要弄周出來了，就告訴一位害了多年的肺病的朋友，他說他不會。而且他遞給我一本「宇宙風」看，那上面刊着周的一些短信，有的說希望南邊的人不要把他當作李陵看，應該當作蘇武，有的說他想逃到南

邊來也似乎無辦法，因為他的老家浙江紹興已沒有了家，而且恐怕南邊也非安全的地方。表面上看起來那些話是悽慘的，但骨子裏卻是胡塗。他既不是國家派遣到異域去的使者，而且現代的「匈奴」又沒有扣留他，我們無法把他當作蘇武。至於家的問題呢，南邊雖說沒有舒服的風雅的「苦雨齋」，卻有無數的人在活着，在流亡着，在工作着，在戰鬥着，在死着。

我去北平的時候晚一點，已在周做了「閉戶讀書論」而且談談「草木蟲魚」之後了。雖說我在大學圖書館裏借讀過他的許多散文集子，到了他老是公安竟陵派，老是抄書的時候我實在讀不下去他的文章了。雖說他就在我所住的大學裏教書，我實在不大知道他。因為我既不是讀日文系而又不像我的一位同班一樣，學的是哲學卻專門去聽外系的「名人」們的課。直到有機會和一個自言要做一篇「周作人論」而終於未做的同學熟識後我才從他知道周是怎樣一個可笑的人。據他說周上課總是晚到早退，而且下課後便慌忙的離開學校，因為他怕「庸俗」的學生們去麻煩他。在街上他有一個特別的規矩，不招呼人。而且他暗暗的忌妒着魯迅先生。他曾經對

我那位同學說，「人們都說魯迅對青年好……」他的意思是頗不以爲然。那時「文學」上發表了一篇「林語堂論」，裏面提到了藹理斯。作者胡風先生在那時是一個比較陌生的筆名，他似乎懷疑是茅盾先生，在辯論着「藹理斯的時代」過沒有過去的文章裏他暗射了一句，他說現在的人們喜歡把目前比作半夜或者子夜，彷彿光明就在前面。實際呢，據他的高見，似乎黑夜是很長很長的，他們哲人也不過是火炬的傳遞者而已（這是他最喜歡引用的藹理斯的比喻）。從他這見解可以推知，他大概是很高興聽見雄鷄的長鳴的。然而由於有人非難，他也興奮起來了。他大批的寫文章，也就是大批的抄書。有些刊物他每期都有文章，而且即是小刊物吧他也給，似乎他也要對青年好。不過他的署名似乎是有等級的，大刊物是知堂，小刊物是智堂，跖堂，一直到印成書時才是周作人。

那已經是無數的青年在艱苦的而又勇敢的從事着救亡運動的時候。那已經是瘋狂的而又陰險的敵人加緊着侵略的時候。周那時做了幾篇「日本管窺」。他窺見了一些什麼呢？他用的那個管子大概是東洋貨，所以只窺見了日本的「人情之美」。

對於法西斯化的日本軍閥他雖未看出美點，也沒有把那醜態強調的指出來。據他平時的文章，他是對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時都非難的，他把對飢餓的人民叫着「束緊你們的肚帶吧」的德國國社黨和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而且消滅了失業和文盲的蘇聯共產黨看作一個窟窿裏的狐狸。

然而日本的軍閥卻終於在他們的軍用望遠鏡下窺見周的美點了，他們要請他「出山」。雖說在「長谷川與山本對談」裏山本歎息着：

「周作人也是海軍學校的學生呀。：他就是魯迅的令弟，夫人還是日本人呢。：目前在北平，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以周君爲中心者實大有人在。但是，可惜他目前已不問世事，已無再出工作之意了。」

周終於和日本大使館參事官森島守人，僞新民學院教授瀧川政次郎，日本陸軍特務部成田貢，武田熙，以及僞組織裏面的議政委員長兼教育部總長湯爾和等一同出現在「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中，出現在大阪的「每日新聞」上了。寬大的人頂

多只能說他是「被拉下水」。然而他爲什麼要坐在「苦雨齋」裏等着被拉呀？

這是值得找出一個答案來的。長久的脫離了時代和人羣的生活使他胡塗，使他胡塗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繼續過舒服的日子，因此雖說他未必想出賣祖國以求敵人賞賜一官半職，也終於和那些出賣祖國的漢奸們坐在一起了。

五月十一日深夜

關於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

C. S. 同學：

收到了你六月二日的信。

你所提出的問題我是應該而且願意答覆你的。你說，「那麼就請先生在給我的私信裏，或是什麼雜誌上回答我，大概我總不會把那回答漏過眼去。」現在我決定遵從你所提議的第二種方法，寫一封公開信給你，因為也許還有旁的人懷着同樣的疑惑。

「關於周作人事件，」你這樣說，「被許多報章雜誌宣傳，我覺得有些頭痛。以前對於這個人的書我很愛讀，因此對他也相當崇敬，但現在許多人說他是漢奸，我又覺得是可能，而在五期『工作』上先生論過以後，這一期朱先生再論一下，卻使我有些胡塗了。何先生，能給我一個圓滿的解答嗎？」

能不能給你一個圓滿的解答我是沒有把握的。在對於周作人事件的主要感想上，朱光潛先生說，「以他在日本知識界中的聲望，日本人到了北平，決定包圍他，利用他，這是他應該預料到的。到現在他還滯居北平，這種不見機實在是很可惋惜。」我說，「他爲什麼要坐在苦雨齋裏等着被拉呀？這是值得我出一個答案來的。長久的脫離了時代和人羣社會的生活使他胡塗，使他胡塗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繼續過舒服的日子，因此雖說他未必想出賣祖國以求敵人賞賜一官半職，也終於和那些出賣祖國的漢奸們坐在一起了」。這是我那篇文章的結論。都是責備周在平津失陷後不離開北平。我說「他未必想出賣祖國……」也和朱先生的「附逆，做漢奸，他沒有那種野心，也沒有那種勇氣」那句話的意思差不多。

朱先生和我不同的是所根據的材料所持的態度。

我根據的材料只是周參加「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事實，成都報紙上的一篇周列名於僞「學制研究會」的通訊，和他近幾年以來的胡塗的思想，生活態度，因此我推斷他「被拉下水」並不是絕對不可能。朱先生根據的材料卻多有一

種從北平來的私人書信。朱先生說，從那書信看來，雖說苦雨齋中時有漢奸敵人的足跡，雖說日本人「重視並欽遲」他，就是說，想利用他，周還沒有怎樣受利用。因此朱先生說雖已被拉，尙未下水，並且說「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談話和照片，「尙待考證」。

其次，朱先生所持的是一種原諒的態度，我是一種攻擊的態度。我認爲對於周近幾年來那種胡塗的思想和生活態度是應該攻擊的。他對於人類的和我們這民族的前途的悲觀，不信任，他對於這偉大的時代尙未到來以前的前夕和那時候無數青年的奮鬥的冷淡，暗暗譏笑，以及那種如朱先生所說的「一個爐火純青的趣味主義者」或「一個老於世故，怕粘惹是非者」的生活態度，都是錯誤的，有害的，應該強調的指出，而且加以攻擊的。正因爲他有着那種胡塗的思想，正因爲他過着那種胡塗的生活，他才脫離了時代和人羣，才想留在失陷後的北平作「現代的蘇武」，才墜入了一種可悲的泥淖裏。

所以對於朱先生那篇文章最後一段中的這樣幾句話我是不能贊同的：

「有人藉這次大阪每日新聞的傳聞，攻擊到周氏的私生活，罵他吃苦茶，妬忌魯迅，街上遇人不打招呼。世間完全人恐怕很少，我相信周氏也難免有凡人所常有的毛病。但是這另是一問題，似不應和他是否附逆相提並論。我們對自己儘可謹嚴，對旁人不妨寬厚一些。……」

說周吃苦茶的另外有人，至於他忌妒魯迅，街上遇人不打招呼，卻是我根據一位北大的同學也就是周的話寫在我那篇文章裏的。我是引來幫助我們了解周的生活，並不是罵。爲什麼要說出他的「私生活」呢？因爲了解一個人是需要了解他的生活的，不然，他寫文章說話非常中聽，而做人行事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也可以把我們騙着了。一個人的生活哪些是「私」的，哪些是「公」的，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我寫那篇文章時沒有想到，也不願顧忌到。

世間完全人很少是事實，不過因爲完全人很少而認爲一切人都一樣好，一樣壞，或者知道有好壞不同，而且好壞的程度各不同，而仍然沒有愛憎，沒有各種程度不同的愛憎，我認爲是不對的。也許一般人可能都有他的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

面。但我們要看哪方面是其主要的。假若光明成分是主要的，我們應該愛他。反之，我們應該憎惡他。而且了解一個人還應該用歷史的看法。就如周吧，他曾經有過他的黃金時代的，就是我那篇文章提到的他在五四運動前後對於新文學的貢獻，和他在語絲時代的積極態度。他那時候主張人的文學，攻擊舊倫理思想，攻擊陳西滢之流的紳士教授，並不是由於「趣味主義」，也並不「怕粘惹是非」。然而，漸漸的他灰色起來了，竟至於走入黑暗中了。因為什麼呢？膚淺的歸罪於他的年紀的衰老是不行的，世間不是也有着七十幾歲的羅曼·羅蘭，八十多歲的倍那德·蕭嗎？周不過才五十幾歲呀。

那麼到底因為什麼呢？

我再重複的說一次吧，由於他漸漸有了胡塗的思想，而且過着胡塗的生活。

至於朱先生最後提出的「對自己儘可謹嚴，對旁人不妨寬厚」的做人處世的原則，我也得補充的說一句，我認為「寬厚」也應該看對什麼人，對於我所憎惡的人物，我不能「寬厚」。

你信中提出另外的問題，將來有機會再詳細答覆你。
視努力。

六月四日夜

坐人力車有感

坐在車子上，讓別人彎着背流着汗水的拉着走，卻還有什麼感想，而且要把它寫出來——真是可恥笑的事。

然而事實上我常常坐車，常常看見人坐車，人拉車，也常常有感想，沒有辦法。「那麼你就不要坐車，」也許有人要這樣說。「你要坐車就不要有感想，或者有感想也不要說出。」這都是辦法。可惜我都不能實行。

那麼我還是寫下去吧。

我曾經聽見過這樣一句斬釘截鐵的話：「中國根本沒有階級」。但有時候這句話又變形蟲似的變成這樣：「他們是想挑撥階級間的感情」。對於根本沒有的東西怎樣挑撥它們的感情呢？可見得大概還是有了。不過在這整個民族爭取生存和解放的抗戰中，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應該大家共同來背負起這個巨大的苦難。然

而前幾天報紙上載着：重慶六千人力車夫罷工了，因為車行要增加車租，從每天三角改成每天四角。

成都有多少人力車夫呢？我不知道。他們每天的車租是多少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成都的人力車很便宜。當我坐着成渝長途汽車快到牛市口的時候，一位同車的乘客向我說，「成都人非常狡猾，尤其是車夫。不過你記着，成都根本沒有上一角錢的車價，就是從東門到西門……」到了成都我就常常坐車了。坐在車上，我常常想到有一部分人類的腳大概要漸漸的退化，因為它們用厚厚的牛皮包着，而又很少被使用。

人力車在我國很普遍，因此很少人覺得這種以人代步的辦法不合理。據說羅素在西湖看見轎夫一邊流汗，一邊帶着笑容，曾因之讚歎我國的「精神文明」。國粹論者們也可以把人力車的存在當着我國的「精神文明」的又一個證據吧。不過德國有名的報告作者基希在「祕密的中國」裏卻這樣寫着：「黃包車是從日本傳來的，但是它的發明者——唔，這算什麼發明——是一位歐洲人……」彷彿很引以為恥似

的。因為「幹這職業的平均壽命是五年半」。而且那種哲學家所讚歎的笑容也很少在人力車夫的臉上出現。人力車夫們多半是憔悴而又粗暴的，他們稍微碰了一下便要破口大罵一陣。

拉私人包車的似乎衣服穿得像樣一點。在成都的街上，私人包車和普通人力車是很有分別的，它們除了漆得黑黑擦得亮亮的而外，還有那特別向上彎彎的翹起的車桿，像一道門。我曾經懷疑的向一個朋友說，「不知道是直的好拉些嗎還是彎的？」「你去拉拉吧，」他笑着回答。我隨後又聯想到有一時候在四川很流行的「拱桿轎子」：在兩根長長的微微拱起的木桿上，轎子幾乎紮在前面的桿頭上，抬起來幾乎是前面轎夫一個人背。

說來說去，我的希望其實是極其低廉的。我希望至少不再看見這種人拉人，人抬人的現象。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

論家族主義

我時常到祠堂街去逛書舖。看見了願意看的新刊物我就買一本，不願意買的也間或翻一翻，看它到底說些什麼。有一次，我翻着一本自稱爲「民意」的刊物，發見了這樣一個題目：「從民衆逃難現象看出中國家族主義的偉大」。這題目不但長，而且有些古怪。我是中國人，我身受過家族主義的恩惠，而且逃過難，然而我卻想不出它有什麼偉大。我們只能以果子來判斷樹。家族主義所結的果子實在是苦澀的，粗糲的，腐爛的。

於是我站在書攤前來從那篇文章看一看家族主義的偉大了。

它所說出的家族主義的好處大致不過這些：抗戰發生後人民們有的跑回在後方的老家，有的回在失陷的區域中的老家去當順民，使難民的數目減少，因此國家也少些麻煩；在平時，家族主義已無形的解決了在西洋成爲社會問題的問題，就是瘋

癩，殘廢，失業的人可以由家族養老終身，而且父子夫婦之間可以共財，兄弟之間可以分財，親戚朋友之間可以通財，比西洋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的倫理思想強得多。

這使我失望了。假若在敵人佔領的區域裏人們都做了順民，誠然會一個難民也沒有，也沒有一點麻煩，但與其讓敵人強迫編制他們爲僞軍來屠殺我們，讓敵人奸淫着他們的妻子，姊妹和女兒，讓敵人如報上所說過的用船載走他們的孩子，載去受奴隸訓練，誰都會異口同聲的說，我們寧願多些難民，我們寧願家族主義少偉大一點。其次，說瘋癩，殘廢，失業的人在我國只有被家庭養着倒是事實，但卻限於養得起閒人的家庭。假若所有的人都有一個闊家庭，那就真連在歐美鬧得很厲害的失業都不成問題了。可惜我國的家庭和世界各國一樣，也是有錢的少，窮苦的多。因此失業等現象還是毫不客氣的成爲社會問題而存在着。至於最後一種說法也是事實。不過事實有時是有好幾個面孔的，而且它不會戴上面具。父子，夫婦，兄弟，親戚，朋友之間真是在實行着共產主義嗎？也不盡然。父親大概要因爲衰老或者死

亡而放棄了家長的地位才把財產給與兒子。舊社會的妻子則大多數是丈夫的奴隸。兄弟因為分財往往喪失了手足之情。親戚朋友若僅通財而不還財，也往往弄到法庭相見。

雖然我沒有學過社會科學，我想家族主義大概是原始社會以後的產物。無疑的在歷史上它曾盡了它應盡的（或者就算是偉大的吧）力量。然而到現在還來歌頌它，實在太晚了。由於儒家思想配合着專制君主的愚民政策，我國的社會組織在進化的路途長久的停頓着，家族主義的力量遂延長到現在。對於一般人的懶惰，自私自利，責任感的薄弱，以及家庭中婦女地位的低下，兒童之受着鞭打，摧殘，它都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

近幾年有一些人想把已經倒場的過去的倫理思想或者旁的偶像重新豎立起來，而且給它們重換金身。這和破落戶的子弟想從灰塵中找出一些古董來作鎮家之寶一樣，雖說可以找着折足的銅鼎或者上綠鏽的銅鏡，雖說他們都古色斑斕，有好古癖者會把玩不忍釋手，實際是不能拿來使用的，不能拿來代替瓷碗或者玻璃鏡子的，

而且他們身上還有着不潔的細菌。比較好的辦法是不要太留戀過去的繁榮，也不要太羞慚於目前的衰弱，努力的工作，以建立一份新的文化財產。

六月二十九日清早

某縣見聞

一

我到電報局去發一個電報。我把一張寫好電文和號碼的信箋從櫃台上的小窗戶遞進去。那坐在辦公桌的側邊的職員，一個穿着藏青色西服而且偏分着頭髮的年青人，接過它去看了一下便大聲的說道：

「濟南已經不通電報啦。」

「怎麼就會不通呢，我剛才從那邊回來？」

「你看那牆上貼的布告吧。」

我真有點兒不相信。那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不但濟南沒有失陷，就是南京，上海，太原都還沒有失陷。於是我走到牆跟前去讀那布告。那上面大意是說湖南，湖

北，安徽，河南等省調動軍隊，官電甚忙，暫停收發人民拍往那幾省的電報。總之，其中沒有山東。

「那上面沒有說濟南不通，」我走回櫃台前去這樣說。

「濟南不是在湖北嗎？」

「誰告訴你濟南在湖北？」

「你說在哪一省？」

「山東，」我說出這兩個字，不願再多說了，但接着還是補上了一句，「假若你不信，你可以拿你那簿子來翻一翻。」

電報終於發了，不過當我走出電報局的大門，走到大街上，我還在想：一個電報局的職員不應該不知道濟南在那一省呀。

二

在一個親戚家裏，在那陰暗的潮濕的小屋裏坐着我，坐着我的一個剛在初中畢

業的兄弟和兩個親戚。一個已七十多歲了，比我大兩輩；一個是平輩，大概還比我還年青一點。

我們談到一種可怕的東西，白面。雖說我還沒有看見過那種東西，但回到縣里來聽得的消息已很够使我彷彿看見一個暗暗的存在着的可怖的網了。這想像顯然與我曾經讀過的一本高爾基傳記有關係，那上面說舊俄時候的密探勢力像一個暗暗的存在着黑色的大蜘蛛網，而沙皇就是那網的中心的大蜘蛛。白面之流入四川據說是最近一兩年的事，然而已經造成一個巨大的細密的網了：除了在城市裏「不脛而走」外，它已深入到每一個鄉場，而且據說有些鄉場上已能自己製造。

我的那位年青的親戚談得很起勁。他說他親眼見過了幾十家人因為抽白面而破產，而流落，而倒斃。他說萬安橋頭晚上站着的那些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鷄一樣的女人都是抽白面的女人。

我的兄弟的主張是嚴厲的禁止：完全槍斃。

然而我那位七十多歲的親戚卻提出異議，他說那不過是嗜好罪，不是死罪。

後來我才聽說他家裏，除了他和他的兒子而外，他的兒媳婦，孫子，孫媳婦，甚至那不過幾歲的曾孫都有那種嗜好。

這使我疑惑。嚴厲的禁毒條例不是貼在城市裏和鄉場上的牆上嗎？不是還有着負禁毒禁煙的責任的機關嗎？於是我又隱隱約約的聽見這樣的話了：還有人從中漁利，從白面販身上漁利，像擠羊子身上的奶一樣，擠乾了又放它出去吃草，吃飽了又捉住它來擠。不過這只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流言而已，沒有人大聲的說出來過。唯一的昭昭在人耳目的事實據說是有一次，一個白面販從監牢裏被帶出來槍斃，他走過街上的時候大聲喊道，「真是不講理呵，把我的金簾子些拿去了還要槍斃我嗎！」

其次是我的一個親戚告訴我，他有一個遠房的姪兒在一個小縣裏當區長，當了半年就弄了三四千塊錢。「怎樣弄的呢，一個區區區長？」我問。「那地方出煙，他大概是從私煙販子身上弄來的，」他像說一件極平常的事情那樣安靜的說。

我時常到書舖去看看，由於寂寞。除了一家常到新書的生意較好的書店而外，大點兒的書舖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名字是一個字也不錯，但並不是真的支店，只是不知是用什麼方法把那招牌取來而已。這兩家是幾乎不到新書的，因此都很冷落，但我也時常去看看，看那些舊書，間或也挑選那沒有讀過的買幾本。

有時正在我挑選着書的時候，樓上便飄下了打牌聲。

這有什麼可怪呢，我認識的人便向我說過，他們有時到商務印書館或者中華書局去打牌。並且他們還說過書店成爲麻將俱樂部的原因，那是一種聯絡，對教育界人士的聯絡，爲着推銷他們的教科書。

但我不能不有一點感慨。

我感慨着這些人既不能熱情的工作，而又沒有正當的娛樂。我感慨着麻將耗費了中國人的無數時間，無數精力。

當我對成人們不滿的時候我常把希望放在下一代人的身上，然而在有着抽白面，抽大煙，打牌，酗酒以及胡裏胡塗過日子的成人的家庭裏，兒童們能够在身體上精神上都健全的長成起來也實在是難事呀。

有一次我到一個認識的人的家裏去，又碰上他和他的朋友們在打牌。爲着禮貌，我不能不在那屋裏坐一會兒。於是我很覺奇怪的注意到那牌桌子側邊的一個用舊報紙蓋着的舊網籃了。那裏面是裝的什麼呢，那也許會裝過書籍，旅行的舖蓋捲，食物以及破皮鞋之類的網籃？我正在猜想的時候，一個嬰孩的哭聲從那裏面發出來了。

我感到那是一個很好的象徵：那個中國嬰孩的「搖籃」。

不過我還得說明一句，它還是極少數的幸福者之中的一個，因爲它出生在中產人家，不至於餓死，凍死。

有時我在街上碰見了征發出省的壯丁的行列：穿着襤褸的甚至不能蔽體的衣服，每人手中拿着一個土碗，一雙竹筷，默默的走着，像一羣乞丐。有時手臂上還繫着棕索，一串一串的繫着，像一羣犯人。那種木然的神氣彷彿說他們對於他們的新環境和行動和未來都莫明其妙。而且仔細的看一下，那長長的行列裏有些人是一點兒不「壯」而且尙未成「丁」。

爲着解答我的疑惑，一個從鄉下來的朋友這樣說：

「我們鄉下的壯丁是用錢買來的。大家都不願當壯丁，所以只有一家出點兒錢，湊起來買那些流氓，驢神，抽白面的去，五塊錢一個。」

「五塊錢他們就願意嗎？」

「他們還有逃跑的希望。聯保主任就教他們逃跑的方法。」

是的，送到城裏來後的壯丁就時常有逃跑的。爲着填補名額，城裏還鬧過幾天拉壯丁。據說從鄉下來的土頭土腦的人走到僻靜的巷子裏便有被拉的危險。

當我從鄉下回到城裏來，路上經過一個地方，有一個衣服穿得乾淨一點的農民

向幾個人大聲的吵着什麼，彷彿剛才發生了一件什麼嚴重的事情：

「要還駝的！我說他要還駝的！」

我停下來和他談了一會兒。才知道他是一個保長，剛才發生的事情是去捉壯丁，打了一場才捉住了，不過被捉住的仍然不服氣，又哭又吵，說聯保主任收過他十塊錢，包不抽他當壯丁。所以這位保長說聯保主任一定要把錢還出來。

「你們怎麼不到區長那裏去告他？」我問。

「告他！我們怎麼莫有告他！他給區長篩了七百塊錢，專員篩了兩千塊，什麼事都沒有了。」

他把數目說得那樣確定，彷彿他親自數過一樣。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在成都追記。

川陝路上雜記

梓潼之夜

梓潼。一個四川北部的小縣城。

沒有報紙。沒有中級學校。這小縣的全縣人口約共十七萬，而煙民竟約有八千。據說每月縣政府要解走公煙賣的錢和燈捐三萬多。

旅館裏的客人就可以隨便買煙膏來抽。

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上牀後聽見隔壁房間裏有陝西口音的談話聲，呼呼的抽大煙聲。繼續聽下去，還有低下的女人的聲音在勸着「吃一口」或者「再吃一口」。

從那女人的一些零碎的話推測起來，似乎她是因爲抽大煙而窮困而開始賣淫

的。無疑地她現在是被叫來陪燒煙。

那些聽不完全的陝西口音談到了成都的「三益公」，那是在成都最熱鬧的大街春熙路上的一家古怪的營業場所，裏面有着戲院，茶館，理髮店和澡堂。「有一次我去那裏洗澡，」有一個在這樣帶笑帶罵地大聲地敘述，「我說，喊一個擦背的來吧，他媽的，來了一個是女的！」另外一個說到擦背的男孩子，也帶着很猥褻的口氣。他說某一個闊人的兒子去洗澡，一次給某一個擦背的男孩子六十塊錢。

後來那個陪燒煙的女人似乎要走了，在用低小的撒嬌的聲音爭着錢：「再給我兩角錢。」說了許多告哀憐的話才似乎達到目的了。這時那給錢的人開心地說道，「就在這裏睡一晚吧，給你五角錢。」「不行，」低小的聲音這樣回答。「六角錢？」「不行。」「七角錢？」「不行。」「八角錢？」「不行。」……那男子這樣開玩笑地像唱一個非常簡單而又非常下流的歌似地逗着那女人，結果還是那女人的很低小但聽得清楚的聲音結束了這對白：「給我兩塊錢吧。」

那女人終於走了。那屋子裏的兩三個陝西口音的人說了幾句話也都不做聲了。

最後的兩句聽得很清楚。一個說，「真是又可憐又可笑。」一個說，「她大概有三十多歲啦。從前兩塊錢還不行呢。」

夜是悽慘地靜。

第二天起來，我好奇地猜測着那兩三個陝西人是誰。旅館裏住着好幾個陝西人，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穿着漂亮的黃色軍服。他們都有着成人的正經的臉。我無法猜測。

白龍江邊的兩個插曲

白龍江在奔流着。

載着我們和幾十箱汽油的汽車駛到這樣嘉陵江的支流的岸邊停住了。這裏叫郭家渡。因為下了幾天雨，江水驟然漲高了起來，而且流得很急。

公路得從江面走過去，然而沒有橋樑。

四川公路局的先生們是聰明的，他們會用木船來代替橋：汽車坐在船上便可以

從江面走來走去了。木船不會自己走動，作爲它的人造的脚步有着木槳，舵，篙竿和船夫的手臂。在白龍江，還得加上拉繆夫。由於江水奔流得很急，木船必須先讓許多拉繆夫背着繆索拉到上游，然後斜斜地划過對岸去。

今天，一個拉繆夫被白龍江吞食了。當我們的汽車到了寶輪院便碰着這樣一個悲慘的消息：今天淹死了一個人。到了江邊才知道是一個拉繆夫。

我們下了車，站在江邊眺望。江水從左前方的山峽間衝出來，由於山勢的控制，突然轉了一個九十度的角度的大彎，然後伸直地奔向另一山峽。碰着了接近江邊的或隱或現的石頭它便發出陰鬱的怒吼。

在對岸，三輛載着故宮博物院的古物的汽車停着，像三只愚笨的甲蟲。在接近對岸的那邊，一條狹長的沙壩靜靜地伸入上游，伸入水中。

今天，那個不幸的拉繆夫就是爲了一輛載古物的汽車要過河，就是背着繆索走在那條沙壩上，走着，走着，一下失足落到水深處去了。奔流得急的江水帶走了他，沒有一點聲息。沒有撈着屍首。

他還有年老的父母。他還有妻子和一個小孩。不幸的消息到了他家裏，他的父親用腦袋在石頭上撞，他的妻子哭着奔到江邊，要跳水。

其他的拉繹夫們簡單地，零碎地把這些說了出來，似乎心裏都填滿了悲戚和憤怒。他們一定在想着這種職業的悲慘性。他們每月工資七元至九元。淹死後的撫卹費每人三十元。他們每人穿着一件青布背心，在胸膛的兩邊現出六個白布做成的字，每邊三個：「昭化車站船夫」。

一個年青的小個子粗野地罵着，說他們今天忙得還沒有吃晚飯，說那位死者正當他的母親把午飯送來，他才吃了兩口便放下，便去拉繹，便死了。

天色已晚。從遠遠的山峽間，黃昏像藍色的薄霧一樣慢慢地展開。

我們的汽車還是停在河邊。我們到時木船已划過那邊了。隔着相當寬闊的河面，我們望見那邊的一輛古物汽車像愚笨的甲蟲那樣蠕動着爬上了木船，那邊的一些拉繹夫彎着身子，背着繹索走在那條沙壩上，然後那只木船終於越過疾流，寬闊的河面和困難，斜斜地衝到了這邊渡口。

這時我在想着一張舊的成都「新新聞」上的一條消息。那是關於中英庚款本年度的分配計畫的。中間有一項是墊付故宮博物院古物運費六十餘萬元。

我們的汽車決定開回寶輪院去過夜。寶輪院離郭家渡十里，在申報館的地圖上是「保寧院」。在那裏的車站的門前掛着這樣一個木牌：「四川公路局昭化車站」。但昭化縣城還在幾十里以外。

白龍江在陰鬱地奔流着。

當我正坐在燭光下記着日記，老楊喊我們出去看「啄啄神」。

不遠的家人戶的門前已擠滿了人。我們從人的肩頭間望進去。屋子裏擺着兩張方桌子；裏面的一張上供着一個塑成坐着的姿勢的神像，伸着兩只胖大的腿和脚，像一個大胖子；外面的一張上點着香燭。桌子的右邊，一個男子在做着法事。他穿着藍布衣服，和普通農民的裝束一樣，只是頭上用紅布纏着幾片像花冠一樣顫動的白紙。他低着頭，躬着背不住地可怕地顫抖着，顫抖着，過了許久，然後用

手拍着桌子搖着「師道圈」，然後抱着神的右腳，一邊用臉去擦，一邊繼續顫抖，然後跳了幾下，用一種奇異的毫無意義的聲音唱了起來。在旁邊，另外有一個人翻譯着，說的是病人得病的原因。

我們回到棧房後，一個夥計告訴我們那家的小孩病了，所以請「啄啄神」來醫治。「『啄啄神』會檢藥呢，」他說。「有一次，那個請啄啄神的人正在扶着神的腳檢藥，一個兵進去看。突然給他一耳光，叫道：『你不扶着，看它還動不動！』結果它哪裏會自己動呢。」他說那個人專靠「啄啄神」吃飯。降神一次可以掙幾角錢。「啄啄神」是木頭做成的，手脚可以活動。

這使我想起了伊凡諾夫的「當我是一個托鉢僧的時候」。當那小說裏的主人公第一次公演吞劍的把戲，當劍插入他的喉頭，痛得很厲害，當他的班主向他說，「你怎麼不向觀眾笑呢」，他便忍痛做出笑容。

我的脚第一次踏進陝西

擁有着廣大的土地的我的國家，雖說敵人已侵入你的胸部你仍然擁着廣大的土地我的國家，今天我的脚第一次踏進了你的——一個名叫陝西的省分。

然而，你看呵，我的脚的第一步踏在陝西的土地上之後，一件使我感到羞恥的事發生了。

寧羌車站。我們下了車。我打開我的手提箱讓盤查所的憲兵檢查。一個戴着鋼盔的憲兵首先從我箱子裏拿起一本書來。那是一本很薄的定價一角錢的「觀念論」。一本哲學書。他很注意地翻了一翻，便捲着拿在左手裏，不還我了。他的右手又拿起第二本仆着放在箱子裏的書。他翻過來看。他失望似地很快地放還原處。那是季陵在廣元買的一折八扣的「西遊記」的第二冊。我的手提箱裏就只有這兩本書。最後，檢查完了，他輕輕地向我說，「這本書我拿去啦。」那本薄得可憐的「觀念論」不動地捲在他左手內，他說話的態度彷彿向我借去看似地。

接着他去檢查另外一個人的行李。「我是做鐘表生意的，」那個人說。他也不動手翻一翻，便叫他的一隻大皮箱關上了。

我們去找旅館。車站所在的這一條城外的街很髒。旅館也沒有乾淨的。

晚上另外兩個盤查所的憲兵來查店。看了我們的護照和箱子之後，有一個特別問我帶沒有帶什麼書。這使我追悔先前應該向那位憲兵提出質問：「你爲什麼要拿去？」雖說我明知那本小書被沒收的原因是它封面上印着的一行小紅字：蘇聯大百科全書版。

他對於我的質問的答覆也許很有趣味吧，我這樣想。

這種有趣味的答覆後來我聽見別人轉述過了：

「這些書是到處公開賣的，你爲什麼要沒收？」

「你公開地買的就公開地沒收。」

我歌唱延安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着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羣一羣地，穿着軍服，燃燒着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在青年們的嘴裏，耳裏，想像裏，回憶裏，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着宏亮的動人的音調。

這簡短到只有兩個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麼呢？

包括着三個山：西山，清涼山，寶塔山。

包括着兩條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在三個山的中間，在兩條河的岸上，一個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

包括着歷史和傳說：韓琦，范仲淹治理過的宋代的邊城；明代以前相當繁榮，

回回叛亂以後才衰落下來……假若你去訪問清涼山上一個六十歲的老人，雖說他臥病牀上也會滔滔不絕地從同治年間談到現在。但是讓我只談現在吧。

包括着陝甘寧邊區政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毛澤東同志。

包括着一些學校：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

包着不斷的進步：

兩年以前，「紅軍」未到的時候，這是一個荒涼的窮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壓着繁重的捐稅，每月每家要出幾元或者幾十元。現在，商業繁榮了起來，有了三萬以上的資本的商號。

一年以前，「紅軍」已改成了八路軍的時候，人口還只有四五千；飯舖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頭挖成的碟子，彎的樹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沒有招牌，買錯了東西很難找到原家去換，因為它們有着同樣骯髒，同樣破舊的面貌；大禮堂沒有凳子，舞臺上只有一盞煤汽燈，十幾只洋蠟做成的「腳燈」，簡單的舞蹈和「活報」。現在，人口增加成一萬多；街上充滿了飯舖，飯舖裏有了叫「蜜汁咕嚕」或者「三不

粘」的延安特別菜；所有的商店都換上了藍底白字的招牌，淺藍色的鋪板，像換上了新的整齊的衣冠；大禮堂演着三幕戲，放映着有聲電影，「夏伯陽」或者「十月革命中的列寧」，而且觀衆要按門票上的號數入座。

兩月以前，當我坐着車子，大睜着眼睛走進這個城的時候……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也有了許多改變了。代替了一下雨便泥濘難走的土路，一條石板鋪成的漂亮的街道從南門一直伸到城中央的鼓樓而且還在向前爬行，不久便會伸到北門前去。

這個活着的城像一個活着的人，不斷地生長，不斷地改變它的面貌。

「延安有什麼可寫呢？延安只有三個山……」我們這民族的巨人毛澤東同志穿着藍布制服，坐在一間套房裏的一條小白木桌前，幽默地客氣地微笑着向我們說，當我們告訴他想寫延安。但是他接着很正經地，很肯定地，雖說仍是客氣地加上：「也有一點點兒可寫的。」

一點點兒？依據我兩個月來的理解，依據我誠實的語言，這個形容詞的正確的

解釋應當是「很多很多」。我充滿了印象。我充滿了感動。然而我首先要大聲地說出來的是延安的空氣。

自由的空氣。寬大的空氣。快活的空氣。

我走進這個城後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滿意着這種空氣。

這裏沒有失學或者失業的現象。沒有乞丐。沒有妓女。對於外面的深懷成見，專門造謠中傷的人們，這裏流行着一個非常寬大的稱呼：「頑固分子」。

你覺得太寬大了嗎？

「是呀，太寬大了！」一位曾經在巴黎生活了十年的女作家大聲地叫着說。因為她非常關心延安。因為她聽說日本報紙上已登出了這裏的後方醫院的照片。因為她認為有些三不四的新聞記者應當加以限制。因為他們有着值一千塊錢以上的夜間可以攝影的開麥拉。

但是這對延安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害，敵人直接地或者間接地買去了一張照片。敵人的特務機關佈滿華北，敵人買去了衆多的華北地形的測量圖，然而卻買不

去更衆多的華北的人民，在華北許多城市失陷以後，我們還是陸續地建立起來了許多游擊根據地。

你還是認爲對外面來的人應當加以限制嗎？

「不，我們不願加一點兒限制，」一位高級工作同志在一個集會裏說。「我們認爲到延安來的知識分子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假若有一萬個科學家，工程師要到延安來，我們就挖五千個窖洞給他們住。」他說到抗大的名額滿後在從這裏到西安的沿途的電線杆上都貼着「抗大停止招生」，「抗大停止招生」，但還是有許多青年徒步走來，而且來後還是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沒有一個人被拒絕回去。他說到認識人不能單看缺點，而且從缺點也可以看出長處：驕傲的人有自信心，可以把計畫好的工作交他去做；怯懦的人謹慎，可以當會計；弔兒郎當的人會交際；而普通認爲背景複雜的人多半經驗豐富，知道許多理論，總會接近真理，承認真理……」

但是，但是這種自由的寬大的空氣不會影響到工作的緊張，生活的嚴肅嗎？

「是的，邊區講民主，又講集中，」一個從友區來的參觀者向我們的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同志發問了，「但爲什麼我們的學校一實行民主便弄得亂七八糟，不能集中呢？」

「是的，邊區增進工作效率的方法有突擊，競賽，」另一個參觀者，一個友軍裏的高級政治工作人員，也發問了，「但爲什麼敵軍裏採用這些方法不能收到效果，而且大家認爲什麼飛機，烏龜是騙小孩兒的呢？」

「這大概，這大概，」穿着布制服，蔴草鞋，端坐在一條木桌前的成仿吾同志回答，「因爲邊區有着共產黨的存在。有一個號召，黨員首先便作起來，便沒有問題了。」

爲着證實這個解釋的正確性，一個同志告訴我這樣一個小故事：

今年秋天。天氣已冷起來了，正在修築着的汽車路要通過一條小河流。工人們站在河邊，望着澄靜的寒冷的水，有點兒遲疑，政治委員首先赤腳跳下去，大步走着，說「不冷」。於是大家都跳下去。於是大家在淹沒着腳脛的水中工作，直到起

來時有些人的腳上的皮膚裂開了，出着血。

這是一個動人的例子。然而一般地說來，在工作的困難的岸邊，並不是一定要共產黨員先跳下去然後大家才跳。許多非共產黨員也一樣緊張地工作着。

那麼缺點呢？缺點呢？難道一點兒缺點也沒有嗎？

「說到缺點我卻還沒有發見。我才到兩天。呼吸着這裏的空氣我只感到快活。彷彿我會經常想像着一個好的社會，好的地方，而現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種想像里了。」

兩個月以前，當我在魯迅藝術學院的一個座談會上這樣結束了我的拙劣的談話，一位曾經學過兩年海軍的文學系的同志站起來了：

「我們的生活也並不是毫無困難。我們寫東西的時候沒有桌子，只有一塊放在膝頭上的木板。下雨的天氣，從窰洞裏走下山來路非常滑，常常一個一個地跌倒，滿身是泥。冬夜裏鋼筆尖都凍結了，要放在嘴裏呵幾口氣才能寫字……」

兩個月以後，當我這樣素樸地歌唱着延安，我承認我們的生活並不是毫無困難。但比較一年以前，一般的物質生活已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我們成天緊張地快活地工作着，很少的很細微的物質生活上的困難像放在三牀鴨絨被下面的幾粒豌豆，恐怕真要傳說裏的公主睡在那上面才會輾轉不安。

所以這不能算作延安的缺點。這一點兒也不能使那些深有成見，專門造謠中傷的「頑固分子」滿意。因為他們不相信眼睛，不相信理智，卻相信着怪誕的幻想。當八路軍在華北建立着，鞏固着發展着許多游擊根據地的時候，當八路軍的兵士們在前線流着血的時候，他們在後方互相做着鬼臉地冷冷地說，「八路軍游而不擊。」他們的神經非常銳敏，聽到「八路軍」便聯想到「共產」，便想到他們的銀行存摺。

那麼錯誤呢？錯誤呢？難道每一個人都沒有犯過錯誤嗎？

「錯誤在延安不能長成起來，」一位詩人同志告訴我。「今年春天。抗大的一個小隊裏競賽着內務的整齊。因為被窩厚，不容易摺成現直角的方形，有人發明了

用牙齒把摺痕咬成一條直線的方法。而且有人仿效。這把我氣着了，我給毛主席去一封信，我說，假若延安出了幾個用牙齒咬被窩的斯塔哈諾夫，不但是中國的笑話，而且是世界的笑話。很快地這種錯誤便被糾正了。」

所以我說延安這個名字包括着不斷的進步。

所以我們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所以一個青年電機工程師不滿意地說，「這些人花費太多的時間在唱歌上，但現在還不是唱歌的時候呀。」一年以前，我在外面，我在一本談延安的小冊子上碰見了這樣一個老實人，我笑了，我喜歡他。同時我想，延安的人們那樣愛唱歌，大概由於生活太苦。然而我錯了，剛剛相反地，是由於生活太快樂。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延安。

日本人的悲劇

我在思索着日本人的面部。

日本人的面部是呆板的，沒有表情的。日本人的面部是在笨拙裏隱藏着狡詐的。日本人的面部是驕傲的，當他走在中國的土地上。

我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或者天津日租界旭街遇見過他們。

當他們帶着轟炸機，炸彈，坦克車，大砲，毒瓦斯和刺刀在我們的許多省份裏散播着殘暴以來，在我們的想像裏，日本人的面部更變得難於形容的可憎了。瘋狂的人或者喝血的獸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在戰地最使人痛苦的是缺乏飲料水而最使人快樂的是看見以槍刺插進支那婦女的陰戶。」然而一個日本兵士這樣地想而且說了出來。瘋狂的人或者荒淫的獸不會有這樣的行爲：把一個無力反抗的女性追逐到屋頂上，而且在那裏強奸起來。然而一個日本兵士在太原附近的村子裏這樣地污辱

了一個農婦。

憑着理智，我也能够同時想到在這些失掉了人性的人以外，在海的那邊，在日本島國內，有着更衆多的柔順地屈服在軍部，警察制度和不幸之下的人。但他們的軍閥從他們當中挑選出來派到我們國家來的卻是這樣的代表。

無數的中國人在說着這些大和民族的代表的殘暴，無恥或者下流。

首先讓我們翻開一個被他們收買了的山西小商人親筆寫的記錄。一本嵐縣軍民稽查處油印的小冊子。漢奸賈萬海的供狀。今年四月十九日陽曲縣大牛站的偽村長介紹他到太原去受日本特務機關的訓練。第一個日本人向他們講「滿洲國」出產着許多農產物的改良種子而且耕種不用牲畜，盡用機器，一點兒不費力；將來中國被征服後，也可以變成那樣。第二個日本人講中國可憐得很，只有一種單線的鐵路，日本國家卻非常闊，有複線的，有複複線的，有四線的，更有六線的；將來要請他們到東京玩遊觀景，不花錢。說來說去，最後叫他們愛護同蒲路，不要讓過路的人在鐵路附近走，不要在鐵路附近五里之內種高莖的莊稼，只可以種山藥蛋，豆子，

因爲恐怕「匪徒」藏在裏面劫車。第三個就傳授作漢奸工作的方法了。對於這些無知的貪圖小利的小商人或者地痞流氓或者抽大煙的（根據另一個漢奸的供狀，這幾種人是他們的良好工作對象），日本特務機關的人說他們侵略中國是爲着想使它成爲一個「美麗」的國家。然而緊接着這些花言巧語的轉述，這個小商人突然這樣寫起來了：「這是日本鬼子欺騙人民的手段！日軍開走的時候前幾天就往附近村裏拉毛驢，拉騾馬，要豬羊，打鷄子，找鷄蛋，燒桌椅，板凳，門窗，打人殺人……見心愛的東西想拿什麼就拿什麼，如拿不了就損壞，見了好姑娘媳婦，把男人趕出外邊，把門鎖上，隨他自便……」他寫了一大篇。這些在他心頭壓了很久的話現在才有機會痛快的說出。雖說他無知，他貪圖小利，他的眼睛還沒有瞎，他看見了這樣的很多不「美麗」的事實。

日本人喜歡傻氣地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當作傻瓜。根據十月二十日靈邱上寨寄來的一封信，日軍在東河南強迫農民們去參加他們召集的羣衆大會，在會上說他們去年到這裏殺了八十多個人是極大的錯誤，現在願意改過自新，望老百姓加以原諒。

並且說，「八路軍對你們怎樣，我們也對你們怎樣。我們要 and 八路軍一樣對你們好。」寫信的罵了一句「敵人不要臉到這種田地」就不願繼續寫下去了。緊接着這些鬼話而來的事實我們是推想得到的。搶劫着糧食，輪奸着婦女，搜索着他們所要求的一切東西。最後，游擊隊出來襲擊了一次，全村的老百姓在他們眼中都成了「共軍」，和着房屋牲畜一起被燒死或者殺死。

因為八路軍在山西的各個角落不斷地打擊着他們，因為山西的農民很快的武裝起來，成了游擊隊（敵人很頭痛的叫他們為新八路），日本特務機關的人不能不在他們的「皇軍」的簡單明白的殺戮，搶掠和姦淫之外，另外加上一點兒卑劣的小欺騙了。「宣撫班」的年青女子坐着汽車到太原附近的村子裏來每家發一小包糖。強迫農民們去參加什麼會的時候給男的一只紙煙，女的幾根線。把從那個村子搶來的糧食，運一點兒到這個村子來發，說是「改良種子」。和着這些農產物還發着鴉片種子，而且強迫農民們在肥沃的土地裏種。高興的時候，給村長斟一杯酒：「八路軍，吃你們，喝你們。你喝一杯。」不高興的時候給他幾耳光，把他的妻子女兒搶

走。或者拍着被拉去給他們挑水的農民的肩：「你們的毛澤東的心壞了，你的心好！」但發現了他有一個弟兄在游擊隊裏，便把他捆起來，強迫他喝兩碗煤油，吃一碗鹽巴，放在大太陽底下晒；晒了一陣又喝煤油，吃鹽巴，又晒；然後斬斷他的腿，他的胳膊，破開他的肚子。

山西的農民是很老實的。農村裏面幾乎找不出任何武器。他們並不喜歡戰爭。然而他們勇敢地，自動地替我們的軍隊送糧食，抬擔架，而且參加游擊隊。因為他們看清楚了侵略者的面目。那種難於形容的可憎的面目不是塗上一點兒胭脂就可以遮掩住的。

八月四日的晚上，八路軍一二〇師的一營去襲雁北榆林車站的敵人，繳獲了許多武器，罐頭，書信，日記。一個敵兵在日記裏敘述他怎樣作一個「斬首的志願者」，乘着憲兵隊的汽車，去演習砍犯人的頭。二十四個連沼兵團高梨部隊的兵士用汽車送來了。「聽說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者。第一回是憲兵砍了三個人。第二回輪到我。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一刀砍去，犯人的頭顱就應聲落地。我真不愧

是一個有英雄氣概的軍人。但因用力過大，頭丟開五六尺遠。砍到第二個，頸下殘留着三分厚的肌肉。第三個也一樣。真壯觀呀！砍完後我覺得喉嚨太乾涸了，喝了點兒酒潤潤喉嚨，再看其他的志願者砍頭的花樣……」算了吧，我不願再看什麼花樣了，雖說他們是在殺着他們的同族。就在對付他們的同族上，日本人的暴行也是不少的。野戰醫院裏把不應該切掉腿的輕傷兵的腿切掉。部隊是把沒有死去的重傷兵扔在火裏燒。或者爲着欺騙他們國內的人，爲着證明他們說中國人喜歡砍頭的宣傳，把死去的傷兵的頭割下來，然後照像。

無數的事實使我疑惑着日本人究竟是不是人類。是不是還有旁的民族像日本人那樣完全失掉了人性的？是不是日本也會變好起來？而那又在什麼時候？

憑着理智，我也能够馬上就想到那二十四個在張家口西北，在一個山裏，爲着同情他們國內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而被砍頭的日本兵，無疑地他們是也同情着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的。然而二十四是很小的數目。在海的那邊，在日本島國內，大多數是柔順地屈服在軍部，警察制度和不幸之下的人。在海的那邊，在中國的土地

上，他們的軍閥用兵艦，火車和汽車送來的差不多全是失掉了人性的代表。

關於這些大和民族的代表，我並不想專門搜集他們所散播的殘暴，無恥和下流的事蹟。因爲那太多太多了。相反地，我倒願意像發掘古物一樣，忍耐的，注意的尋找他們的良好的行動。

我並沒有絕望。然而我僅僅尋找了一個孤獨的例子。南京失守後的一個夜晚，幾個日本憲兵押送着一羣醫院裏的女看護到一個收容所去。在途中，他們每人分了一個，帶回他們駐紮的地方。當前後左右的屋子裏的婦女們在恐懼着，哭泣着，反抗着她們所將遭受的污辱，一個中年的敵兵把一個嚇壞了的可憐的女孩子帶到床邊，用簡單的中國話說，「你睡下，我不動你。」他把一張沙發拖到門口去作他的床。但直到那個女孩子多疑地提心吊膽地在被窩裏躺了許久，直到她被單調的催眠的脚步聲引入了睡眠，那個中年的敵兵還是垂頭地來回地在靠着門口的牆邊走着。

這位女看護的奇遇輾轉的傳到我的耳裏的時候，我在那個敵兵身上意外地看見

了一個沒有失掉人性的日本人了。但他爲什麼那樣憂鬱垂頭的來回的走到深夜，是什麼沉重的難堪的東西壓在他身上，壓在他心裏？

法西斯軍閥的野心，侵略的戰爭，無意義的死亡……這些東西是可以使一個良好的日本兵士垂頭喪氣的苦惱地走到天亮的。

除了這個憂鬱的中年兵士，我還聽見過一個覺悟了的日本俘虜的故事。去年冬天的的一個夜晚，在陽曲忻縣間的同蒲路上，八路軍一二〇師的一個連捉住了一個日本鐵路工人。突然襲擊的槍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慌張得不穿衣服就從車上跳下，赤腳亂跑像一只頑強的驚恐的小野獸。幾個人的手臂才把他捉住。他絕望地伸着頸子等候中國的大刀，然而他得到的卻是中國的衣服，鞋襪和溫柔的安慰。他開始信任着中國人了，他安靜地聽着我們的敵軍工作同志的解釋。最後他問：「你們軍隊對我們好，老百姓是不是也一樣？」第二天，因爲他的腳凍壞了，給他一匹馬騎着，派人護送他到師部去。路上經過村莊，老百姓們圍着看。有一個送他一個饅頭，他接了過去，發傻的望着它，突然哭了起來。到了師部，他接受着更好的優待：師部

的人吃着小米，莜麵和山藥蛋，他吃着麵包，饅頭，荷包蛋和肉湯。有人陪他散步，打球，有進步的日文書給他讀。他用心的把讀過的片段摘錄在日記本上。以後來了另外一些俘虜，他對他們解釋着許多問題。當一個後來的俘虜晚上用繩子吊下城牆去逃走，又被捉住回來，他非常生氣的罵他，甚至哭了起來，連飯都不吃。

然而他不是「皇軍」。他是一個工人。而且，「爲什麼他那樣愛哭呢？」我聽完後這樣追問。「日本人是很感傷的。」不過我不喜歡那種感傷。我似乎從他的眼淚中窺見了日本人的過分的民族驕傲。對於真理和錯誤，一個健康的正常的人是用理智來思索，來判斷，來決定愛和憎，而不是用軟弱的眼淚。

我這幾句話也許有點兒苛刻。我的意思是想說明長久地生活在崇拜天皇，武士道，大和魂精神和奴隸教育裏，日本人的天性已被埋壓得薄弱了。許多奇異的現象赤裸地呈現出來。在一個工業化的現代國家裏還存在着一個「神的血統」的天皇。在機械化的部隊中還佩着神符，千人針。一方面「皇軍」在別人的國家裏放肆地屠殺，搶掠，奸淫，另一方面他們的家屬在自己的國家裏偷偷地哭泣，向着無知的神

道祈禱和平。

大概他們誰也沒有想到會遇着我們這樣長久的抵抗，誰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泥腳」踏進中國就像踏進水裏。八路軍一二〇師的一位旅長告訴我，在開始作戰當中，敵兵相當頑強，就是受了傷，只要手能動便還是抵抗；後來，被打得潰敗後便躺在地上裝死，把他叫起來，好好的說，便跟着走；到了現在，被捉住後見着中國人便行軍禮，而且常有單獨地或者成羣的自動來繳槍的。對於被捉住的或者自動來繳槍的敵兵，他接着說，八路軍現在是對他們解釋一陣，當天放回，因為從繳獲的文件中，知道敵軍有着這樣一條防止逃亡或者投降的陸軍刑法：「戰時，軍中，或戒嚴地境，無故離職過三日者處五年以上苦工或監禁。」

嚴酷的刑法並不能幫助敵人解決他們在中國所遇到的困難，正如屠殺欺騙都不能停止我們的反抗。這就是日本人的悲劇。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山西嵐縣

一個太原的小學生

姓名、年齡、籍貫之類

韓天衛，他把他的名字寫出來是韓天衛。

自然年齡：十四歲。但他長得和十五歲或者十六歲的男孩子那樣高。

就算是太原人吧（雖然他說他原來是文水人），既然他的家已在那個常常括着北方大陸的風和塵土的山西省城裏住了七八年，他的父親現在還在那裏的一家英國教會辦的醫院裏當大夫，他全家人都還住着那醫院的職員住宅。

他的哥哥從前是同蒲路上的平遙站，忻口站的站務員，永康站的站長，現在呢——自從那條山西省特有的窄軌鐵路被敵人佔領後，他便成了一個閑居家中的失業青年。他的受過中等教育的嫂嫂便成了他母親洗衣，作飯的助手。他的兩個姊姊在

醫院附近的教會學校裏上學，全家的生活依託在他父親的每月六十元的進款上。過着憂鬱的，失掉了祖國的人的日子。平常大家都不提日本人，當作沒有「那回事」一樣，過一天算一天。只有當他哥哥的一些在八路軍的朋友來訪之後，家裏的空氣才像風吹過後的水一樣顫動着，微笑着，響着。那些冒險的朋友真的就像沒有蹤跡的風一樣，忽然來了，忽然又去了。他們認得是八路軍，旁人卻不認得。他們來訪之後，家裏就談着八路軍又在哪兒打了一個勝仗，又殺死了多少日本人……

他家裏的人差不多都信耶穌教。「因為中國人犯罪啦，要受苦，」他母親常常歎息着說。他不相信。「你不信耶穌怎樣得了？」他母親罵他。「我不管，」他說。他不和他們一起去做禮拜。吃飯時候他們做祈禱，他就端一碗飯到一邊去吃。他們向他講耶穌的故事，他不聽，他嫌麻煩。全家人只有他和他九歲的妹妹沒有受洗。

燃燒在中國的土地上的戰爭改變了許多事情。

他的學校，第一實驗小學，變成了第一新民小學。

太原城內的亨得利鐘表店的掌櫃的，一個大胖子，變成了陽曲縣的縣長。

他十天前，還是一個高小一年級的小學生，現在穿着灰色的棉軍服，右路臂上帶着「八路」的臂章，腰間掛着一只六輪子，站在八路軍的一個師裏的敵軍工作部的屋子裏，和我談着話。

他羞澀地，低聲地和我談着話。他低着頭，兩手不停地玩着一件花線汗衫上的銅拉鍊。他的怯生的眼睛注視在那拉鍊上，一種健康的孩子常有的紅色浮在他的臉上。假若沒有兩道濃黑的不很彎曲的眉毛，誰都會說他像一個女孩子。他是那種不大快活的孩子。在家庭裏，在學校裏都是規規矩矩地，不頑皮，不喜歡說話。過早的寂寞使他傾向安靜，傾向思索。然而，當他有了某種一定的見解，企圖，他會頑固地堅持着，或者勇敢地實行出來。

談話記錄 A

「去年十一月，」他說，「日本人攻了太原城一整夜。黑夜裏砲聲響得很厲害，

我們全家都躲在地陰子裏，睡在地下。那地陰子是磚修的，有兩間屋子那樣大，一整夜誰都沒有睡……

「第二天早晨，聽見街上有人走了才爬出來，到樓上去看，街上亂擺着大車，箱子，衣服；牲口亂跑，家家的門都閉得很嚴。先看見來搜索的日本兵，後來隊伍，洋馬，大砲，坦克車，鐵甲車，一隊一隊地走，皮鞋嘩啦啦地響。我心裏想：進來我們就該死了。我家住在東城，是個要道……那一段街都是住家的……日本兵從北門進，北城殺的人很多，聽說原來打算殺到鐘樓前……」

「對面院子裏有十幾個清道夫沒有跑，都被刺刀奪死了。」

「好多家街坊都被搶了，有的大門上的鎖被扭壞，便進去了。有的是暗鎖，沒有打進去……」

「日本人就是這樣進了太原城的。」

「你覺得太原城和從前有些什麼不同？」

「比從前不方便，不自由，一時不小心便挨日本人打。」

「你看見過日本人打中國人嗎？」

「我看見過。有一次，我騎車上學，看見街上一個小孩用棍子動了一個日本人的小豬一下，日本人便手打脚踢，把他胳膊打壞了。他跑，我也跑。還有一次，我的車子幾乎碰了日本兵。他們橫排着在街上走，他們喝醉了，臉紅紅的，說着話。我趕快停住車，下來，躲了過去。那些酒鬼，無緣無故地打站在街邊的警察幾耳光。」

「老百姓有沒有搬出來的？」

「城裏許進不許出，許人出不許家具出。」

「城裏日本人很多嗎？」

「很多，他們開日本飯館，日本鑿子。還有日本小學，有四五個日本小鬼。」

「你們和他們不打架？」

「哦，有一次，我去買醋，在路上碰見四五個日本小鬼，拿着木棍，木刀，攔住我，打我，我讓開走了。他們壞得很，常常在門口用銅管子水槍射街上的中國人，射到你身上臉上，射後便躲在門裏面。還有一次，我們四五個同學在公園裏用彈弓射下來了一只麻雀，兩個穿黃短褲的日本小鬼不讓我們拿，我們把他按在地上，拿半截磚打，打得他又哭又喊。後來看見有日本大人來了，我們才跑了。」

「你學校裏有了些什麼改變？」

「校長換啦，教職員也全換啦。都是考上的，學問都不如從前好，國語課本也換啦。還有『新民主主義』課本，我們都不用心聽。上課時候胡寫胡畫，傳紙條，畫人人，一天什麼也不覺便教了十幾課。還教日本歌，會唱不會懂。功課比從前鬆，常常開會，貼標語，不去便挨手板。」

「你們不搗亂嗎？」

「誰都不敢，老師們常常說：『你們小心，你們犯嗎？犯啦就是共軍！』」

「你們做的國文是些什麼題目？」

「有一次是『怎樣勸共滅黨』，我沒有做，我不願意，我心裏明白共產黨是中國人，是爲救國的。還有一次，日本小學給我們學校送來了兩個泥人人，一男一女，穿的日本衣服，有一尺多高，老師就出一個題目：『給日本小朋友的一封信』。他叫我們這樣寫：『親愛的日本小朋友，你們送了兩個泥人後，我們也想還你們的禮，等到我們準備好以後就送去……』誰都是這樣寫的。以後學校真的買了許多玩具，小人人，輪船，汽車，大砲，坦克車，派代表送去了。」

「你寫的時候不會想起日本小鬼們欺負你們的事嗎？」

「寫的時候不敢想他們的壞處，怕想多了就寫出來了，就糟了。」

「說你怎樣逃出來的吧。」

「我的朋友叫我出來的……」他說得像一個比他更小的孩子那樣單純。他有一個十六歲的朋友，從前同班，今年上兩個月便到一家像館裏去當學徒去了。他家裏很窮，有一天下學後，他在一條僻街上碰見了他。那裏是一片樹林，那裏從前挖有

防空洞。敵軍進城後，發見有老百姓躲在那洞裏面，便用枯草和馬糞把他悶死，現在已用土堵住了。他們在那裏相見，在那裏談着日本人的可惡。他朋友告訴他，最近他碰見了他的一個從前也是學徒，最近加入了八路軍的朋友。他帶着羨慕的口氣說：「他掛着兩架盒子。」最後他約他明早到那樹林裏和他一同逃走，他一下就承認了。第二天早上，他騎着車出去，家裏的人還以為他上學去呢。

「他們一點兒不懷疑嗎？」

「我天天上課，從來沒有逃過學，」他微笑着說。他似乎驕傲着而又害羞着他是一個好孩子。

冒險的故事是很簡單的

燃燒在中國的土地上的戰爭改變了許多事情，改變了許多人的思想，情感。

整個城市突然落到日本強盜的手中，而且被他們統治了長長的一年，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小學生這很有反面的教育意義。現在他通過了這種困難的考驗，他逃出來

了。

他羞澀地，低聲地和我談着他的冒險的故事。

十天以前的一個早上，他說，他和他的朋友共騎着一輛菊花牌的自行車，奔向新南門，奔向那唯一開着的城門。（「太原城只開一道門？」「是的，自從我們的游擊隊裏的一個莽戰士和人打賭，黑夜跑進太原城去把幾個守門的日本哨兵的頭割了回來，」一個敵軍工作部的同志旁邊答覆我。）兩個日本哨兵，兩個偽警正在檢查着兩邊的進出的大車。自行車輪子輕輕地從中間駛了過去。一會兒，五里了。汾河的一道橋在前面躺着，一個日本兵正在旁邊小便，自行車的輪子輕輕地從中間駛了過去。一會兒，二十來里了。機關槍聲在前面響着。一些在自行車上帶着煤油，棉花的老百姓都下了車，躲在一間破土房子裏。他們也下了車，也躲在那裏。二十來里以外，停着一串日本汽車，有的載着人，有的蒙着白布。游擊隊的步槍聲也在響着，但漸漸的稀了，停止了。等那些汽車開走後，他們從那破土房子裏走出來，找小道兒走。他們知道游擊隊在山裏，當他們走到沒有路的時候，看見了一個十七

八歲的穿灰布軍服的小孩子。「你們的隊伍在那裏？」「回去了。」「你到那裏去？」「回隊伍裏去。」於是：「咱們是同志，」他和他的朋友一齊說。於是：他們到了那個游擊支隊裏。於是：在那支隊裏住了幾天，他就跟着我們做敵軍工作的同志到嵐縣來了。

還有比這更簡單的嗎？

「你的朋友呢？」

「他留在支隊裏當勤務員，不能上火線打仗，他不樂意，」他最後說。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根據去年十二月在嵐縣的記錄寫成。

老百姓和軍隊

第一封信

……我們在採黃蒿紮防空偽裝，用白布縫棉襪，把破軍服撕成布條，打草鞋。我們將有一次行軍。到那兒去呢，要走多遠呢，因為是軍事祕密，我還不知道。我能够告訴你的只是我決心跟着這軍隊走一趟。這個離日本軍隊只有一百多里的晉西北的小縣城，除了曾經被轟炸一次，一個多月來都是很安靜的，缺乏着戰爭的氣息的。現在我願意帶一本厚厚的練習簿，一只自來水筆，去接近戰爭。

你會想起我從前是多麼憎惡戰爭吧。我曾經稱它為「人工製造的死亡」。我曾經痛恨過人類為什麼愚蠢到不斷地舉行大規模的自我屠殺。自從我知道槍和子彈能够突然一下停止人的生命，我就不願意摸它們。當我讀到那個世界聞名的相對論的

發明者愛因斯坦在論文裏攻擊着軍隊，我曾經熱烈地同意過。那些鞭子一樣的句子我已不能背誦出了。大致他是說那些專門從事殺人的人不但不知羞恥，反而像雄雞一樣在街上排隊走着，穿着漂亮的制服，而且奏着軍樂。我那時也認爲他們應該感到羞恥，因爲農人能够種出五穀，工人能够做出各種物品，而他們卻只會製造殘廢和屍體。

我這種對軍隊的憎惡不僅由於書本知識，和我幼年的生活也有關係。在我的家鄉，在二十年以前，買東西少給錢，拉夫，隨便打罵人是一般的軍隊的紀律。縣城裏還駐紮過一個由土匪收編成的團，他們輪流地，一連兩連地化裝到鄉下去搶劫，綁票，攻打寨子，算作「關餉」。從外省來的「北兵」也好不了多少，除了壞得稍微笨一點兒。他們常常在街上端着一杯污水走，看見衣服穿得漂亮的人便故意一碰，讓杯墜落到地下，然後扭住你，說你碰翻了他的官長叫買的西藥，直到你從身上摸出五塊十塊錢來賠他。最足以說明那時的軍民關係的莫過於曾經在我們縣裏大鬧過一次的「神兵」的口號。那些被土地的貧瘠，層層的剝削和飢餓磨折得近乎發

狂的農民，在幾個自稱爲「大菩薩」，「二菩薩」的人的率領之下，相信着吞了符水便可以刀槍不入，從偏僻的山裏開始了暴動，執着鋤頭，菜刀或者火鉗，一直進攻到縣城附近，喊着一句樸素的口號：「殺灰狗兒」。他們繳得了新式的武器總是用石頭扎壞，或者扔進河裏。

然而抗戰使我糾正了我這種樸素的情感和見解。我不能不承認人只要不至於甘心被殺死，被當作奴隸，他即使憎惡殺人也得拿起武器。我不能不感謝那些爲民族的生存而戰鬥着的兵士，靠了他們農人能够在土地上播種五穀，工人能够在工廠裏製造物品。我才清楚地看見了兩種不同的戰爭：正義的解放的戰爭，和非正義的侵略的戰爭。

而且我感到了做一個人的責任，尤其是做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我從四川投奔到華北。

當我第一次和幾個八路軍的兵士坐在一輛沒有篷的汽車裏時，我不但不討厭他們，畏懼他們，而且感到可以和他們作朋友。他們對我談着山西游擊戰中許多故

事，談着「長征」，談着他們的家鄉和幼年。當我們結束了那從西安到延安的三天旅行，當我們下了車，當我們將要分別，我和他們親熱地拉手。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手曾經殺過人。相反地，我想到了從這些粗糙的農民的手，自由的新中國將要被建立，幸福的人的生活將要被帶來。到了這裏，有一天我去參觀砲兵營，意外地碰見了他們當中的一個。我已經叫不出他的名字了，然而他那樣親切，那樣快活，忙着給我燒開水，引我去看大砲，和我談話，使我不好意思再問他的名字。

現在我將跟着這樣的一些兵士去行軍。我自己也早已像一個兵士了，穿着棉軍服，戴着軍帽……

第二封信

……我們有過了一次小小的「長征」。我們到河北中部來了。

我們並沒有遇到戰爭。搶過同蒲路的晚上，日人從幾里路外的據點亂放着砲，我們沒有理他。搶過平漢路的晚上，我們的隊伍剛過了一大半，一列日人的巡路車

駛來了，然而與其說它驚動了我們，不如說我們驚動了它，因為它很快地逃走了，沒有停留，也沒有放一聲槍。第二天，我們在遼闊的平原上行軍，日人的飛機來追了我們五次，丟了不少的炸彈，放了不少機關槍，結果我們犧牲了一名馬伕。

然而並不因為沒有遇到戰爭我們這次行軍便成了一次沉悶的旅行。許多生活裏的有趣味的瑣事，將來由我的日記告訴你。我急於要向你說的是這次行動使我清楚地了解了華北抗戰的情形，了解了裝備如此不完善的八路軍爲什麼能够支持如此艱巨的華北抗戰，了解了爲什麼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沿途並沒有特別爲我們建築的兵房；過去那種強迫「紮兵」的辦法我們也不採用；我們每天由一些副官在大隊伍之前趕到要宿營的村子裏去交涉，讓有空房或者可以騰出空房的人家自動地讓我們去借住。這就是說整個隊伍分住着幾個村子，而在每個村子裏又分住着許多人家。這就是說每天晚上我們和老百姓在一起。當我們進屋的時候，走的時候，或者借用東西的時候，我們總是很客氣地說，「打擾你們」，或者「麻煩你們」。從他得到的回答也總是一些親切的話句：「咱們都是一

家人」，「咱們軍民合作」，或者「咱們不是爲了打日本嗎？」

每天都見到的事實使我每天都感動。

當我們的隊伍白天經過一個村子的時候，村子裏的老頭兒，小孩兒，男的，女的，披着老羊皮的，穿着紅褲子的，總是從家裏跑出來，擁擠地站在街邊，看我們過。有時指着我們俘虜來的高大的日本馬，他們說，「那是匹洋馬。」有時看見馬也披着蔴做的偽裝，他們快活地笑了起來。我知道這也可以說由於鄉村生活的寂寞。但在從前，就在抗戰剛發生的時候，老百姓對旁的軍隊卻是用另外一種方式歡迎。當隊伍還沒有到村子裏他們便早已逃到山裏去了。他們對比寂寞更能夠傷害人的飢餓，寒冷都能够忍耐。進入了晉察冀邊區的境內，因爲老百姓更經過了組織，我們在沿途更看見了歡迎我們的標語和放在路邊讓我們喝的開水。

在孟縣沙湖灘，我借住的家裏的主人是一個很和氣的老頭兒。他抓一大把黑棗來送給我吃；我問他的價錢，他說：「這用不着買。」他好意地告訴我這味道像葡萄乾，又像乾了的柿餅的小果實，吃多了會肚子痛，吐清口水。談到八路軍，他

說：「你們就和姚遂王的軍隊一樣好。」我當時想：姚遂王是誰呢？難道還有和八路軍的紀律一樣好的軍隊嗎？後來我才猜着了，我才自己笑了起來：他說的是那存在於渺遠的古代的傳說中的堯舜。

在到平山縣祕家會之前，在我們將要經過的道路的旁邊，一大羣老百姓在那裏站着隊，有的還執着紙做的小旗。他們當中的那些小孩子在唱着歌，唱着「抗戰已經來到了……」當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突然熱烈地喊起口號來了。一些很簡單的口號：「歡迎八路軍」，「堅持抗戰」，或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而聽着那種從心裏面叫喊出來的聲音，看着那些穿藍布長棉袍的農民把右臂高高地舉起，我真感到願意去做一個爲他們去戰死的兵士。

「爲什麼老百姓對八路軍這樣好呢？」你會問。

讓我把八路軍的有名的「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抄來回答你吧：

三大紀律

- 一、堅決執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 二、絕對服從上級命令
- 三、不拿羣衆一點東西

八項注意

- 一、進出宣傳
- 二、打掃清潔
- 三、買賣公平
- 四、說話客氣
- 五、借物送還
- 六、損物賠償
- 七、不亂拉屎尿
- 八、優待俘虜

這些條文說明了八路軍的日常生活，說明了它爲什麼老打勝仗，說明了它爲什麼這樣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幫助和親近。

剛才我到村公所去和幾個老百姓談了一會兒。他們告訴我去年國民黨的軍隊從河北撤退的時候，政府機關的官吏們都逃到河南一帶去了，而且接着這裏那裏都起來了一些司令。一個司令往往只統率幾十個人，他們向鄰近的村子要白麵，肥豬。爲着抵制這種軍隊，有些村子自動地聯合起來，自己也產生一個司令。「這屋子去年就是司令部呢，」一個年青小夥子笑着插進來說。一直到呂正操將軍來後，這一帶才恢復了秩序。而曾經在這個小屋子裏住過的那個司令，一個擁有八九十個弟兄和幾十條槍的農民，現在卻被收編爲呂的一個騎兵連長了。他們告訴了我一些故事，又對我發出了一些問題：「聽說政府下令，無論那部分的軍隊見着老百姓都要敬禮，是嗎？」一個中年人問我。對於這個可笑的，然而卻被他很鄭重地提出來的問題，我只有回答：「我們還沒有得到這個命令。」同時我心裏笑着：「抗戰後軍民關係的變動是多麼大呵，從前他們看見戴軍帽的人就逃跑，現在卻想着所有的

兵士都給他們敬禮了。」當我和他們告別的時候，我真的就給他們行了一個舉手禮……

第三封信

……你曾經聽見過機關槍在十里路以外響着的聲音嗎？這一向我常常聽見。我覺得這種聲音比雷一樣響着的大砲聲還要不好聽得多。我想到了一個比喻：像害瘡疾的人在敲打着牙齒。

我們還一點也沒有恢復長途行軍的疲勞便碰上了日人的圍攻。我們僅有的一個主力團到東邊也打，到西邊也打。而且這是平原游擊戰。簡直就是連着一天一晚地打硬仗呀。因為我從馬上摔下來一次，把一只手臂摔壞了，我沒有到那個團裏去慰問。而且我在想，我用什麼去慰問呢？用一些空話嗎？我感到我身上帶到的不是槍，不是手榴彈，而是一枝自來水筆，已經很可羞恥了。

倒是老百姓們的慰勞對戰士們更有用一些。作戰的時候，附近的村子裏的居民

都趕着送饑餓，送烙餅，送小米粥，而且有的竟固執着要一直親自送到戰壕裏去呢。有了受傷的戰士，他們就抬擔架。戰爭結束後，他們更用大車載着豬，羊，毛巾去慰勞整個的團。

「我們一定要爭取休息，至少要爭取一禮拜的休息。」司令部的高級指揮員說。

現在我們就真的休息下來了。大概日本軍隊也落得在這次圍攻的失敗後休息一下吧。現在老百姓們慰勞的範圍更擴大了，慰勞到我們這些司令部的，政治部的非戰鬥人員的身上了，用毛巾，襪子和鞋。關於我們這些已經穿上了脚的鞋還有着一些小故事呢。當羣衆團體裏面的人在附近的村子收集慰勞品，一個乞丐也捐了一雙鞋，而且一個過路的人馬上把他腳上的鞋脫了下來，自己穿着棉襪子回家去，叫他回去後再送來他都不願意……

第四封信

……你想知道我們的日常生活吧。在大後方的人恐怕很難想像游擊戰，尤其是平原游擊戰。在廣大的平原上，四方八面都是路，都是日人的坦克，汽車和騎兵可以衝過來的路。我們靠什麼來遮蔽呢？我們靠人的山，村落的樹林。這一帶的村落真密得像樹林，而老百姓們呢，不但替我們引路，報告消息，而且把許多公路，大車路都挖成了土溝。在河間附近的那次戰鬪裏，日人出城之前先派一個老百姓來偵查情況，他一氣跑了二十里，跑到我們的那個團裏來，報告了日人的企圖和數目。而在日人勢力所及的區域，農民們白天被強迫着修復公路，但在夜裏，他們又自動地去破壞了它。我們只是沒有辦法破壞空中的道路。我們行軍都靠黑夜來遮蔽。我們看熟了北斗星，看熟了黑夜是怎樣變成黎明。

我和政治部的編輯委員會的幾個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最近，一個小夥伴參加到我們的生活裏來了。一個新來的小鬼。他是一個八路軍裏的勤務員的例子，也是一個老百姓參加軍隊的例子。他父親打燒餅，他哥哥當堂倌，而他自己在家裏的工作就是拾柴火。去年他參加了地方游擊隊。他打過一次仗。「那樣一次我拾了一條

命，「他結束他的敘述時這樣說，像是在歡喜他的幸運，又像是在表示對於危險和死亡都滿不在乎。他已經十九歲了，但瘦小得像只有十五六歲。剛來的時候他說他不識字，但現在我們發見了他認識不少的字，而且會唱不少的歌，而且會像一個小的諷刺家那樣說話。他常常一伸手到他的棉制服裏去抓出來一個虱子。「你身上的虱子很多吧？」一個同志問。「不多不多，」他笑着回答。我們近乎強迫地勸他把裏面穿的線汗衫脫下來用開水燙一次，他才聽從了。當我們看見那件衣服上有着很多很多白色的虱蛋，再質問他，他卻像一個樂天的人或者玩世的人那樣笑了起來，彷彿說那些小小的蟲子並不能對他有什麼損害。

昨天晚上，我們的房主人來玩，這個小鬼和他打了一陣鄉談，而且把他參加軍隊的故事又講了一遍。我們的主人也是一個樂天派。他二十幾歲，是這村子裏的自衛軍班長，有一座土房子和十幾畝地。聽完了小鬼的故事，他發表他的政治見解了：「中國人多，日本人沒有辦法。」他說日本徵兵徵到十三四歲到四十五歲的人了，假若中國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的人都參加了軍隊，日本人會不打自退。

我笑着糾正了他：「還是要打才行。」他說兩個月以前，他們就聽說老八路要來了，但盼望了很久都不見來；有一夜，他出去放哨，發見許多隊伍，牲口，馱子成線地走；他趕快回村子裏報告，並且說每個兵士的背上都揹着一個草圈；大家說，「一定是老八路」；大家都非常興奮。「你們老八路真是神出鬼沒，」他結束似地說。「有一個晚上，我到前面村裏去，半路聽見有人喝我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四面看都沒有有人；原來你們放哨的爬在樹上。」

我問他抗戰以前的軍隊怎樣。「也還好，」他很簡單地回答。但我們的小鬼提出異議了：「可不也還好！就是愛打人罵人。」「你挨過他們的打罵？」一個同志問。「我到沒有挨過，但我看見過。」他看見過一個兵因為賣東西的不肯讓價就打他兩耳光。他看見過一個兵用不能使用的鈔票買東西，而且還要如數找補他一些現錢。他看見過一個兵叫老百姓拔牆上的釘子，並且不耐煩讓他去拿鉗子，要他用手拔，結果他兩個手指都出血了還是沒有拔出。他快活地敘述着這些過去的故事，而且學着那個兵罵那個用手拔不出釘子的倒霉的人的話：「揍你這個爬灰頭！」

「你這個龜孫！」

後來我們還談到了這個村子裏的一位過去的名人。一位武探花。關於他我們的房主人講了許多奇異的荒唐的傳說，正如許多地方對於並不太遼遠的過去就有了一些傳說一樣。當他告別回去睡覺的時候，他約我們今天下午和他一起去看那個探花生前使用過的五十斤重的大鐵刀……

第五封信

……我已經在歸途中了。我又過了一次平漢路。這一次我們是在白天過的，因為日人知道了我們的部隊經常往來的那個地方，在那鐵路旁邊的村子裏佔了一間房子，每晚上由兩個日本兵和一挺機關槍在那裏放哨。

這一次和我們一起的兵士很少。護送我們的只有一連人。另外還有幾十個人的肩上也掛着槍，但它們都是被帶到鐵路西邊去進修械廠的。

我們在鐵路附近二十幾里的地方停頓了好幾天。我們的安全與其說依靠自己的

武裝，不如說依靠老百姓。他們不斷地供給着消息。鐵路旁邊的村子照例被日人指定爲「愛護村」，但老百姓們並不愛護侵略者，仍然愛護自己國家裏的軍隊。在我們所要經過的鐵路東邊的那個「愛護村」裏，第一個村長因爲常常讓八路軍過，不去報告，被日人槍斃了。第二個村長以同樣的罪名得到同樣的結果。現在第三個村長，他仍然不知道愛護他的生命，最近因爲讓我們的一些傷兵化裝爲趕集的老百姓，公然在白天坐着火車通過了這條封鎖線，被日人打了兩耳光，而且他所管理的村子被取消了「愛護村」的名字，以表示懲罰。

我的一個同伴曾經提議過我們也化裝走。他說老百姓說這是很安全的辦法。但我拒絕了他。也許由於一種可笑的驕傲或者當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吧，我不願意在這種情形之下就脫下我身上的軍服，雖說因爲經過了一個冬天它已經是又髒又破的軍服。我很簡單地說出了我的理由：「現在沒有那種必要。」

他的焦急很快就得到解決了。昨天清早，我們很輕易地通過了那條在人們的想像中混合着神祕和危險緊張的鐵路。那靜寂地躺着的鋼鐵的軌道仍然是我們的，它

並沒有背叛，它也不能給我們以什麼損害。在經過旁邊的那個村子的時候，許多居民都站在街邊，站在我們的門口看我們過。他們像從熱炕上爬起來，還沒有洗臉，因為我看見了一個小孩子在用手指揉他的眼睛。一個頭髮灰白的老頭子對着我們這一隊走得很快的人說，帶着撫慰的口氣，「同志，沉住氣。」我問他放哨的日本兵走了多久了。「鷄一叫他們就走了，現在早已睡得像豬一樣了。」在我們的隊伍的旁邊，一個普通農民裝束的人一邊跑着，一邊和着送我們的一連人裏的一個幹部匆促地談着什麼，就像好久不見面了的熟朋友突然遇到了而又只有片刻的時間談談那樣。

跨過了鐵路，我們開始跑了起來。望着遠遠的在晨光中顯出青色的山，我們感到快活和興奮，而我們的後面，塵土在飛揚着……

七一五團在大青山

我將敘述人的溫度怎樣征服了寒冷。我將敘述荒涼的山羣和散漫的落後的人民怎樣在人力之下變成了堅硬的堡壘。我將敘述戰鬥和死亡。

我不是敘述幾個新的英雄的探險事業，而是敘述一千幾百個人完成了一個政治上的任務，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據地。

在我開始我的敘述之前，我親切地想起了你，七一五團。代替你的正式的番號，我願意叫你爲「年青的團」。這不是說你的年齡還幼小。我知道你是走過雪山，草地，你經歷過許多歲月和戰鬥。這由於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在河北河間代劉莊，我和你在一起過了一禮拜，而你給了我這樣一個印象：你很年青。你像早晨一樣年青。你像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子一樣年青。你快活，勇敢而且強壯。只有一個年青的人才能帶着歡笑和好脾氣去從事困難的工作。

而且我想起了你，王向榮同志。你這個二十四歲的團長，你開始獻身革命的時
候你還是一個小鬼，你還要別人把你抱上馬背去。現在你卻有着高大的個子，宏亮
的聲音，充滿了健康的血色的臉面。我很奇怪爲什麼殘酷的戰鬥和艱苦的物質生活
都一點兒不能妨害你的生長，你的發育，你的青春的開放。你這個年青的漂亮的團
長，假若把你放在法國的愛情小說裏面，放在華麗的宴會中間，你一定要引起許
多貴婦人的傾心呢。然而我們不是活在那些無聊的小說裏而是活在抗日戰爭中的中
國。而且我們活着不是爲了那些賣弄風情的貴婦人而是爲了無數苦痛的，不幸的中
國的人民。我們還是這樣更好一些。爲着要像一個真正的人一樣活着，我們在目前
還是更願意吃着小米飯，進行着戰鬥，而且甚至於缺乏着充分的安穩的睡眠。是
的，王向榮同志，你眼皮有一點兒腫，你眼角有一點兒發紅，你昨夜一定沒有睡得
好。昨夜，在兩只白洋蠟的光下，你和幾位同志對我談着大青山的情形，一直談到
十二點。而現在，在這早晨，你又在忙着接電話。你在傾聽師部參謀長的指示，而
且跟着又得把這個指示傳給你的一個營。

而且我想起了你，朱輝照同志。你從前是一個礦工而現在是團政治委員。和我談了一半夜還不厭煩，在這早晨，你還要把十萬分之一的軍事地圖鋪在炕蓆上，讓我看一看紙上的大青山，讓我看一看哪兒是薩拉齊，哪兒是察素齊，讓我看一看那些表示山巒突起密密的黑線圈間寫着的高度，拔海 2615 公尺或者 2630 公尺。你一邊指點，一邊說，「在包頭東北的高山上，可以望見黃河，可以望見黃河南岸的燈火。」

而且我想起了你，你常常低吹着口哨的快活的教育股長，吳融鋒同志。我不能忘記那些你對我談雪山，草地和西康蠻子的夜晚。你說雪山上面積着萬年雪，身體不好的人爬到山頂便會呼吸困難，全身發抖，而且倒下死去。你說草地都是山上的平原，裏面有着一塊一塊長着青草的爛泥地，失足踩到裏面便會漸漸陷下去，無法出來。你說男女蠻子都穿着白色或者黑色的羊毛布長袍，吃着青稞麵和茶和酥油做成的粘粑，晚上圍着屋子中央的火盆睡。你說他們很珍視珊瑚：一顆珊瑚珠可以換得許多食品。你說女蠻子的牙齒並不刷洗，然而卻雪一樣白。

而且我想起了你，一營營長傅傳作同志。在一個清晨，在村口的一個空場上，全營的幹部和戰士背着槍和手榴彈和蒿草做的偽裝，在你面前站成一個整齊的講話隊形，而你是怎樣大聲地，有力地對他們講着話啊。你們將去完成一個緊急的祕密的戰鬥任務。你們那樣堅決，那樣鎮定。你們很迅速地開走了，在我的注視之下，在爬在樹上，站在屋頂上的老百姓們的注視之下。後來不久，和着勝利的消息一起，傳來了你帶傷的消息。

而且，最後，我想起了你，我忘記問你的姓名的排長。在深縣戰鬥之後，你失掉了聯絡。然而經過了十七天，你終於輾轉地找到了轉移後的部隊，終於回到二營裏來了，帶着七八個同樣失掉了聯絡的弟兄，帶着各人的武器。當二營營長問詢了你一會兒，拍着你的肩膀叫你趕快去吃飯，把你身上的盒子和子彈袋解下來放在炕上，而且數着子彈的數目，表示一粒也沒有遺失。

我將敘述你們在大青山的故事。我希望我的重述一點兒也不違背你們嘴裏所說出的真實。

經過了幾天的休息和整頓，經過幾夜的充分的睡眠，駐紮在平魯以西的賈家堡一帶的七一五團開始了第二次向北方的進軍。

堅強的進軍。浩浩蕩蕩的進軍。偽裝，馬匹，武器和人在山谷間流動着，像一條河。一個正確的命令實現爲一個雄壯的行動。普遍的政治動員克服了情緒不高和逃亡。

也許有人想起了第一次進軍的經過：在涼城廠漢營遭遇了敵人的九路圍攻，全團從一個很小的缺口突圍出來，繼續行軍一天一夜，沒有吃一頓飯；在廠漢營北邊的馬營村又遭遇了敵人的七路圍攻，而且遭遇了一整夜的大雨，突圍出來後全團在有着半人深的河水裏走着，濕透了所有的衣服；後來，爲了迷惑敵人，才向西轉移，向南轉移，回到了原來的駐紮地。

也許有人想起了第一次進軍前的個別分子的動搖：寒冷的傳說是怎樣苦惱着他們啊，當他們聽說在綏遠，在冬天，人的鼻子耳朵會凍掉，大地會凍裂到一尺多

寬，口沫落地馬上就凝結成冰，戴皮手套必須握成拳頭，下大雪後積雪會把門完全封住，早晨起來必須用鋤頭挖出門來，而且括着綏遠人叫爲「白毛旋風」的旋雪的時候，沒有了太陽，沒有了村子，沒有了道路，誰都不能出門行走。

然而這些都已經過去了。這些記憶應該讓位給信心和希望。

三個經常保證着部隊的勝利的條件，堅決，祕密和迅速，保證着這次進軍的勝利。

敵人的眼睛是老鼠的眼睛。敵人的行動是烏龜的行動。

經過了幾天的白晝行軍，經過了一整晚的夜行軍，他們通過了平綏路。

告別了山西，告別了暖和的八月，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他們到達了目的地。

這裏是大青山了。連縣的山羣。起伏不已的山羣。牛車路蜿蜒在山溝裏，爬在水旁的沙灘上，而且曲折地盤旋到山頂。馬羣，羊羣牧放在長着青草的山坡間。黃色的莜麥在開墾不久的肥沃的土地裏等待着收割。

這裏是大青山了。這是大青山的人民，他們吃着莜麵，穿着羊皮，住着土房子

或者窩洞（在蒙人的屋子的門外常常放着一個蒙古包，表示他們沒有忘記他們是游牧民族的子孫）。寥闊的土地。稀疏的人口。這新來的一團人，這在天亮時突然出現，使人不知是從哪兒來的一團人，必須分散地住到三四十里以外。才能全部都找到了屋子，炕，和飲食。

這裏的人民好久沒有看見過祖國的正規軍了，自從這塊寒冷的然而肥沃的土地上有了「皇軍」，「西北邊防自治軍」和「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他們，蒙人和漢人，必須在賬簿上，書信上，或者貨物的發單上寫着古怪的新的年號，「成吉思汗七百七十三年」。他們，蒙人和漢人，在日本特務機關的挑撥之下，增加了種族間的隔膜。他們經常地聽到那些卑污的陰謀者說着八月十五漢人殺韃子的故事，說着這樣一句古怪的話，「現在不是中華民國的天下，是成吉思汗的天下。」

然而他們知道隨着這些變遷而來的是些什麼。他們知道「皇軍」到一個地方就要「花姑娘」。他們知道身上增加了負擔：現在連餵馬都要上稅。他們知道碰見了「皇軍」必須行鞠躬禮，而且有時會被他們當作馬，被騎在自己的背上，讓他們

笑。他們知道包頭或者歸綏的城內，日本浪人常常把一些商店的主人趕走，把屋子佔據去開賭場，澡堂和妓院，而那些「西北邊防自治軍」常常這樣實行着「自治」，睜着眼睛說一只銅戒指是金的，向街上的商店押十塊錢，二十塊錢。

他們知道土匪比從前更多，更猖獗，常常「請財神」，使用殘酷的刑罰，而且一牛車一牛車地拉走婦女。

現在他們實在歡迎着這枝祖國的軍隊，這枝說話和氣，買東西給錢而且耐煩地講着抗日道理的軍隊。他們實在還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軍隊，住在他們家裏像親人一樣親切，像客人一樣客氣，而且走的時候把院子，屋子和炕都打掃得乾乾淨淨。他們實在還沒有聽見這些道理：祖國還有廣大的土地，衆多的強壯的軍隊，而「皇軍」像一條可憐的牛，前面頭碰到堅硬的牆壁上，後面被拉住了尾巴，不管怎樣發急，怎樣拚死拚活，最後它只有白送上一條命（他們從前卻聽說，「中國完啦」，「中國只有兩架破飛機啦」）。

不久之後，他們更崇拜起這枝軍隊來了。

九月三日晚上，就在他們到後的第三天，七一五團攻下了陶林。九月十日晚上，他們攻下了那個有着寬闊的街道和漂亮的商店的烏蘭花。跟着來的，不管對日軍，對偽軍，對土匪，都是一些光榮的勝利的戰鬪：後窩子戰鬪，榆林灘戰鬪，不拐戰鬪，蘇波蓋戰鬪，陶思浩戰鬪……

老百姓們傳說着二連的戰士們都是連長當的，當這一連緊接着打了三次硬仗之後。

偽軍們更傳說着他們是「神兵」，要在子彈頭上塗了黑狗血才可以打得進，傳說着八路軍作戰前先要吞符水……

然而這支軍隊仍然不過是人。他們仍然會死傷，會肚子餓，會感覺寒冷。當他們走進這寒冷的地域，這寒冷的季節，他們身上還穿着單衣，腳上還穿着草鞋。九月十三日，大青山就飛了第一次雪。他們只有和寒冷鬪爭。他們還得在寒夜裏去打敵人。陸續地經過了兩個月，由於人民的同情和擁護，由於「動委會」的幫助和動員，全團的人才都穿上了皮衣（用他們自己的話，「一身都是毛了」）。

除了這些新或者舊，好或者壞的羊皮，還有另外許多東西使他們溫暖。革命的傳統，抗日的理論……而最主要的是建立根據地的艱苦的工作。

首先，以歸綏到武川的那條路線爲界，這長約千里，寬約三百里的區域被分作兩半。團長王向榮帶一些幹部和戰士到東部，團政委朱輝照帶一些到西部。東部的主要根據地是陶林，武川間的大灘（就在這裏他們建立了一個抗日政權，武川縣政府），其次是四個工作區：歸綏東北部，陶林西南的索拉特，武川，陶林間的土城子，平綏路南的滿漢山。西部的主要根據地是薩拉齊，固陽，武川的交界處，其次是三個工作區：武川西北部，固陽東部，薩拉齊，固陽和包頭間。

對於蒙人，他們提出了「蒙漢聯合，共同抗日」的口號，揭破了日本特務機關的陰謀，而且和蒙人武裝訂立着互不侵犯條約。從蒙人也就不一樣地得到了擁護和幫助。他們給軍隊送馬匹。他們爲軍隊到包頭或者歸綏城內去買藥品，當寄養傷兵在他們家裏，而且遭遇到敵人的搜查，他們說是他們家裏的人。而那個管東公旗武裝的五十三歲的趙太保官府更是怎樣快活地，親切地招待着一個被派去和他接洽的政

治工作人員啊：他說他到過北平，南京；敵人請他去作師長他不去；他清楚國際的情勢，中日力量的對比；他知道偽自治政府有名無實；他問到八路軍從前的經歷，而在最後，他承認八路軍到了他的區域內，由他供給糧食。

對於土匪他們主要的是爭取。對於這些情形複雜的土匪，有的幾代人都是以搶劫爲生，有的大部分抽大煙而且帶着女人，有的上級還好而下級卻難於說服。爭取是很困難的工作，而且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即使他們都願意接受收編也無法供給他們的服裝，武器和軍費。他們只有逼迫土匪到敵人所在的區域去活動，去和敵人作戰。

對於有一些常常說他們並未忘記祖國，不過反正的時機還沒有來到的僞軍，七一五團除了必要時的戰鬥而外，也個別地和他們通信。這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敵人來圍攻時他們預先通信。敵人命令他們進攻時他們並不認真打。而且，當一個僞軍裏的旅接到了七一五團的信，他們晚上召集團長以上的人關着門讀着，商量着，一直考慮了兩夜。第三天，一個五十六歲的蓄着長鬍子的參謀被派來了。他叫魏世

泰。他從前是歸綏城裏的中學教員；在偽軍裏仍然祕密地做着救亡工作；因為收編了不少的土匪，他得到日本特務機關的信任。他談得那樣清楚，那樣堅決。他說他們的部隊一定要反正過來。他回去不久之後，那一旅的兩個團終於反正了；打死了十幾個日本人，衝破了敵人的包圍，而這個動人的祕密工作者，這個愛國的老戰士，就在這次戰役中獻出了他的生命。

至於敵人——這些侵入亞細亞大陸的海盜們的窘狀還需要提到嗎？在大青山，在七一五團到了以後，誰不知道他們只不過守着幾個城，守着平綏路上的幾個車站？

他們的數目很少很少的。他們的可憐的或者可笑的故事卻很多很多。然而我不想在這裏敘述。

因為我要敘述的是七一五團和大青山，是七一五團怎樣從敵人的統治下奪回了大青山，是大青山的荒涼的山羣和散漫的落後人民怎樣能結合成了一個堅硬的堡壘，或者說這一塊長約千里，寬約三百里的土地，東到陶林，西到包頭，固陽，

南到平綏路，北到烏蘭花，怎樣變成了一塊不能消化的石頭梗塞在日本法西斯的喉間。

十二月十九日，七一五團離開了這塊土地，然而他留下了二十幾次的勝利的戰鬥的影響，留下了一個抗日根據地的雛形，留下了它的一營，和它在這裏新擴大的一千多騎兵，和十個游擊隊。

我徒然吃力地敘述了我的故事，我徒然讓我的想像追隨我所聽來的事實奔馳了一個寥闊的區域，一個季節。因為我幾乎一點兒也沒有敘述出你，年青的快活的七一五團，在那個有着濃厚的色彩的地方，完成着一個偉大的艱苦的任務時所經歷的動人的戰鬥，事件和日常生活。我才知道比較於實際的行動，歷史是多麼貧乏無味。我才知道比較於活的事實，傳說是多麼拙笨。我才知道比較於生活本身，想像和推論是多麼沒有顏色。我才知道與其作一個成功的故事重述者，我還是寧願作一個生活中的失敗的人物。

當我隨着你的師部從山西到河北，當你的兄弟七一六團到了那個大平原上便連接地進行了幾次殘酷的戰鬪，需要着休息，當你的長官賀龍將軍歎息着說，「假若我現在身邊有兩旅人：」（隨着他到河北的作戰部隊只有七一六團和一個游擊支隊），我便想到了你，七一五團，我知道你將到來。然而我不知道將在哪一天。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我和政治部在武強東唐旺而師部在半里外的任家莊，拂曉便得到了「戰鬪準備」的命令。那天砲聲是怎樣像雷一樣不斷地響着呵，而且機關槍聲都聽得很清楚，而且敵機就在我們的村子的上空迴旋，掃射。我們的村子外邊在挖着散兵壕。土牆上在挖着槍眼，政治工作人員和小鬼都背上了手榴彈。因為幾里地外戰爭就在進行着，而且大家知道在那裏抵禦着敵人的只有一個作戰能力不大強的河北本地的游擊隊。然而敵人並沒有攻到我們的村子來。我們仍然在那裏睡了安靜的一夜。第二天我們才知道敵人的退卻是由於你的突然的來到，你的突然的打擊。

十五天後，我到你駐紮的村子裏去。我才更多知道了一點兒那天的情形，那天早晨你剛從一個多月的長途行軍到達了深縣北杜莊，剛準備宿營，剛進屋，便發見

了敵人的進攻。雖說當時敵情不明，部隊又連接着行了三晚的夜行軍，一天一夜沒有吃飯，你還是英勇地應戰了，而且後來敵人增援到兩千多人，坦克車裝甲車六輛，你還是支持到下午三點才開始脫離戰鬥。而且脫離戰鬥的時候，你的一個副班長因為帶了傷，獨自落在後面，便把一個手榴彈放在脅下，自己拉了引線炸死自己。

九月十一日

一個平常的故事

答中國青年社的問題：「你怎樣來到延安的？」

我來到了延安。難道這真需要一點解釋嗎？

在開出了許多新窯洞的山上，在道路上，在大會中，我可以碰到太多太多的我這樣的知識青年。我已經消失在他們裏面。雖說每一個來到這裏的人都有他的故事，當我和他們一樣忙着工作和學習的時候，我爲什麼要急於來談說我的？

因爲我曾經寫了「畫夢錄」？

這不是一個好理由。那本小書，那本可憐的小書，不過是一個寂寞的孩子爲他自己製造的一些玩具。它和延安中間是有着很大的距離的，但並不是沒有一條相通的道路。

或者因為我來得比較困難，比較晚？是的，我時常感到比我更年青一些的人要比我幸福一些。我回顧我的過去：那真是一條太長，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時候的同伴們，那些小地主的兒子，現在多半躺在家裏抽着鴉片，吃着遺產，和老鼠一樣生着孩子。我中學時候的同學們現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窺伺着，爭奪着或者保持着——一個小位置。我在大學裏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歡做着過舒服的生活的夢，現在大概還是在往那個方向努力。從這樣一些人的中間我走着，走着，我總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一個榜樣！」我感到異常孤獨，異常淒涼。來到延安，我時常聽見這樣一個習慣語，「起模範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它和我自己的那句話的意思差不多。不過大家說着它的時候，不是帶着悲涼的心境而是帶着快活的，積極的意味。

當我把這一類的感觸告訴一個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同志：

「我們不同，」他說。「我們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這裏一樣。」

是的，他們是成羣結隊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這裏來的，而我卻是孤獨地走了來，而且帶着一些陰暗的記憶。

我想我大概並不是一個強於思索和反抗的人，總是由於重複又重複的經歷，感受，我才得到一個思想；由於過分沉重的壓抑，我才開始反叛。

我時常用寂寞這個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種意味，那種境界和那些東西了，從我有記憶的時候到現在。我懷疑我幼時是一個啞子，我似乎就從來沒有和誰談過一次話，連童話裏的小孩子們的那種對動物，對草木的談話都沒有。一直到十二歲我才開始和書本說起話來，和一些舊小說。我時常徘徊在鄰居的親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聲，不敢說出我的希望，爲着借一本書。當我苦於無法借得新的讀物，我夜裏便在夢中獲得了它。但當我正歡欣地翻閱了那豐富的回目，開始讀它，我就醒來了，它就從我的手指間消失。對於正面的生活，對於人，我都完全沒有懷疑過它們，我以爲世界就是這樣，我不能想像它還可能更好一點。我承認了它。

十三歲的時候，當我又在私塾裏讀着家裏僅有的另一些舊文學書籍，一個叔父告訴我一個他輾轉聽來的道理，地像一個圓球。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那樣可笑。我心裏想：「我所讀過的書上都沒有這樣說過。」讀着禮記上的「曲禮」和「文王世子」，我想作一個兒子真麻煩。但我的思想並沒有滑到那些禮節好不好，應不應該有上面去，只是接着想，好在現在大家都不要着書上所說的那樣做。當我像一個小孩子那樣哭泣着，要求着家裏讓我去上中學，我已經十四歲了。我並不會明顯地想到新式學校比私塾好，僅僅由於一種朦朧的欲求，一種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對新環境的渴慕而已。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時代到來了。由於地域的偏僻，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並沒有給與我多少影響，它留給我的一些較深的印象不過是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當地駐軍的佈告上把「討賊聯軍」改成了「國民革命軍」，和重慶大屠殺後被難學生的家屬們寄到我們學校來的紅色的傳單。我自己另外經歷了一點寂寞的事情，這使我像一個小刺猬，被什麼東西碰觸了一下便蜷縮起來。我用來保護我自己的刺

毛是孤獨和書籍。漢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魚」是第一個深深地感動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歡那用來描寫那個最年青的公主的兩個外國字：beautiful 和 thoughtful。而且他的悲慘的結果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我犧牲。不知這三個思想（美，思索，爲了愛的犧牲）是剛好適宜於我嗎還是開啓了我，我這個異常貧窮的人從此才似乎有了一些可珍貴的東西。我幾乎要說就靠這三個思想我才能够走完了我的太長，太寂寞的道路，而在這道路的盡頭就是延安。但它們也限制了我，它們使我不喜歡我覺得是囂張的情感和事物。這就是我長久地對政治和鬪爭冷淡，而且脫離了人羣的原因。我乖僻到不喜歡流行的，大家承認的，甚至於偉大的東西。在上海住了一年，我討厭體育活動，我沒有看過一次電影，而且正因爲當時社會科學書很流行，幾乎每個同學的案頭上都有一兩本，我才完全不翻閱它們。在一個夜裏，我寫了一首短詩，我說我愛渺小的東西而且我甘願作一個渺小的人。我有點兒惋惜那些少年期的作品後來被我燒燬了，因爲我現在很想看一看我那時是怎樣幼稚地說着那種幼稚的思想。那時我十八歲。

這個幼稚的時期繼續得相當長久，一直到我二十二歲，也就是一直到大學二年級。我給我自己製造了一個美麗的，安靜的，充滿着寂寞的歡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詩和散文，用帶着頹廢的色彩的北平城的背景，用幻想，用青春，而且，讓我嘲笑一下那時的我吧，用家裏差不多按期寄來的並不怎樣美麗的匯票。生活在這樣的小天地裏；我並不感到滿足，如我曾經在別處寫過的，「每一個夜裏我寂寞得與死臨近」。而且，「我遺棄了人羣而又感到被人羣所遺棄的悲哀」。我寫着一些短短的詩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樣寂寞的孩子也能從它們得到一點快樂和撫慰，如同在酸辛的苦澀的生活裏得到一點糖果。我覺得這是我僅能作到的對於人類和世界的一點貢獻。我沒有更大的志願，更大的野心，因為我像一個無知的孩子，對於許多事情還沒有責任感。

但在這種生活裏，新的思想也在開始生長，雖然仍然是不健康的，近乎虛無主義的，在我的思想裏它到底是新的。一個陰晦的下午，我獨自在一條僻靜的街上走着，一個十二三歲的賣報的孩子從我的對面走過來，掛着一個盛報紙的布袋，用可

憐的聲音叫着一些報紙的名字。我看着他，我忽然想起了我家裏的一個小兄弟。一種複雜的思想掠過我的腦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個兄弟一樣年幼，爲什麼他卻要在街頭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類爲什麼這樣自私自利；我想到難道因爲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難過地讓我從我身邊走過去。我忽然決心買一份他的報，彷彿這可以給他一點安慰似的。他從布袋裏取一份報給我，因爲沒有零錢，我給一塊錢讓他找。當他到街旁的小舖裏去兌換，我又忽然想，難道我真還要他把那點錢找還我嗎。於是我跑進胡同裏，一直跑回了我住的地方。一種沉重的難過壓在我心裏，我哭泣了一會兒。當我恢復了平靜，我卻責備自己是一個傻子，因爲我想那個誠實的小孩子一定在那條街上尋找着我，焦急地而又疑懼地。我不安了許久。我後來想寫一個故事來說明一個新生長起來的思想。一個乖僻的年青人在一些陌生的地方流浪了許多年，最後在一個城市裏得了沉重的肺病。他家裏的人得到了消息，遠遠地跑去看護他，而且偷偷地爲他哭泣。但他並不感謝他們，反而被觸怒了似地說：「正因爲每個母親只愛她的兒子，每個哥哥只幫助他的弟弟，人間才如此

寒冷，使我到處遇到殘忍和淡漠，使我重病着而且快要死去。」我的生活限制着我的思想更進一步。我不知道人間之所以缺乏着人間愛，基本上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我不知道唯有完成了社會的改革之後，整個人類的改革才可能進行，而在進行着社會的改革的當中，一部分人類已經改變了他們自己。而且我是那樣謙遜，或者說那樣怯懦，我沒有想到我應該把我所感到的大聲叫出來：「這個世界不對！」更沒有想到我的聲音也可以成爲力量。

但我終於從幼稚走向成熟。我喪失了我的充滿着寂寞的歡欣的小天地。我的翅膀斷折。我從空中墜落到地上。我晚上的夢也變了顏色：從前，一片發着柔和的光輝的白色的花，一道從青草間流着的溪水，或者一個穿着燕子的羽毛一樣顏色的衣衫的少女；而現在，一座空洞的屋子，一個愁人的雨天，或者一條長長的灰色的路，我走得非常疲乏而又仍得走着的路。

我曾經把我的這個改變比作印度王子的出遊。在這兩個時期的中間，我的確有

過一次旅行。然而現在想來，並不是從那次旅行我才看見了人間的不幸，因為它並沒有使我遭遇到什麼特殊的事件，還是從小以來的生活經驗的堆積使我在這時達到了一個突變。我到底不是一個思想家，我十幾年的經歷，感受，似乎還比不上人家一天的出遊。現實的荊棘從來就不斷地刺傷着我，不過因為是比較輕微的刺傷，我這個年幼的堂·吉訶德才能够昂着頭走了一些日子。而且在北平的那幾年，我接觸的現實是那樣狹小，一個小職員的家庭，一個被棄的少婦，一些迷失了的知識分子。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裏來的不過是帶着不幸的陰影，帶着眼淚的愛情。我不誇大，也不減輕這第一次愛情給我思想上的影響。愛情，這響着溫柔的，幸福的聲音的，在現實裏並不完美。對於一個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幾乎是一陣猛烈的搖撼，一陣打擊。我像一只受了傷的獸，哭泣着而且帶着憤怒，因為我想不出它有着什麼意義（直到後來我把人間的不幸的根源找了出來，我才知道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難於有圓滿的愛情）。然而在另一個意義上它的確教育了我。唯有自己遭遇過不幸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同情別人的不幸，而一個知識分子，我想誠實地說了出來反而並

不是可羞恥的，更要不幸降臨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它的沉重。在以前，雖說我感到我隨時可以爲別人犧牲，我至多至多只是消極地做到了不損害人，不自私自利，對於人我仍然是漠不關心的。在這以後，我才如我在別處寫過的，「對於人間的快樂和幸福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對於人間的苦痛和不幸我的驕傲只有低下頭來化作眼淚。」我的偏愛的讀物也從象徵主義的詩歌，柔和的法蘭西風的小說換成了T·S·愛略忒的絕望的枯澀的語言，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受難的靈魂們的呻吟。雖說我自己寫的東西仍然遠離現實，像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們」中的那個失掉了丈夫的愛情的妻子，一邊痛苦到用針尖刺着他自己的手指都不能感到疼痛，一邊還對他的婆婆談說她的幼年的夢想，又像那個爲着同情那個當妻子的人的痛苦而決定放棄愛情的女客人，在黃昏裏，對她將要別離的愛人，在鋼琴上彈着悲哀的小曲。

我到天津的一個中學裏去教書。在那教員宿舍裏，生活比在大學寄宿舍裏還要陰暗。那裏充滿了憤懣而又軟弱無力的牢騷，大家都不滿於那種工廠式的管理和剝削，然而又只能止於不滿。我開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時候會把人壓得發狂。一

個獨身者在吃飯的時候對我歎息說：「我們太聖潔了，將來進不了天國的。」他本來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做事情，但他又不願離開這個都市和它所有着的電影院，溜冰場，網球場和抽水馬桶。因為一個同事病了，一個比較起來還算很強壯的人竟歇斯德里地哭了起來。當他早晨看見闊人們的子弟坐着汽車來上學，他總是對我說：「他們一定覺得我們還不如他們家裏的汽車夫！」或者，「我們有一天會被他們的汽車壓死的！」他是我在那種環境裏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互相影響又互相鼓勵的人。在黃昏中，看着遠遠的煙囪，看着放工回來的小女工沿着那從都市的中心流出來的污穢的河水的旁邊走了過來，我們開始談說着資本主義的罪惡。在我的班上，一個買辦的兒子白天聽我講授着白話文，而晚上回到家裏，又從他的家庭教師讀古老的經書。我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漸漸地感到了羞恥。我彷彿看見了我將被毀壞。而在這時候，學生運動起來了。它更使我們處於一個非常難堪的尷尬的地位，在學生和學校的中間，我們是可憐的沒有立場的第三者。當五二八那天，遊行的隊伍一陣暴風雨似地衝到了我們的宿舍外邊的操場上，歡迎着我們學校的學生們參加，熱烈

地開着會，呼着口號，那像一堆突然燃燒了起來的紅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陰暗，然而我卻只能遠遠地從寒冷的角落望着它，因為雖然我和他們同樣年青，同樣熱情，我已經不是一個學生而是一個被僱用者。

我總是帶着感謝記起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在那裏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樣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者除了自殺便只有放棄他的孤獨和冷漠，走向人羣，走向鬪爭。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間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製造出來的，因此可能而且應該用人的手去毀掉。在那個有着「模範縣」的稱號的地方，農民是那樣窮苦，幾乎要繳納土地的收入的一半於捐稅。那些在農村裏生長起來的青年，那些在他們的前面只有小學教師的位置，每月十二塊錢的薪水和無望的生活等待着師範學生，經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麵，番薯，卻對於知識那樣熱心，像一些新的兵士研究着各種武器的性格和使用方法。而且他們那樣關心着政治，有幾個因為到鄰縣去作救亡的宣傳而被逮捕。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了我並不是孤獨的。和他們一樣充滿了信心和希望，我的情感粗了起來，也就是強壯了起來。當我看見了一

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帶着一束農具從隣縣趕來做收穫時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場一樣的田野裏等待着雇主，晚上爲着省一點宿店的錢而睡在我們學校門前的石橋上，又到青島去看見一排一排的別墅在冬天裏空着，鎖着，我非常明顯地感到了這個對比所代表的意義。我把我這點感觸寫了一首短詩，我寫着：「從此我要噤噤喳喳發議論」，就是說從此我要以我所能運用的文字爲武器去鬪爭，如列蒙托夫的詩句所說的，讓我的歌唱變成鞭笞。

抗戰來了。對於我它來得正是時候，因爲我不復是一個臉色蒼白的夢想者，也不復是一個怯懦的人，我已經像一個成人一樣有了責任感，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四川。我發現我的家鄉仍然那樣落後，這十分需要着啓蒙的工作。在我教着書的一個縣裏的學校裏，教員們幾乎成天打着麻將。當上海失陷，南京失陷的消息出現在報紙上，他們也顯得不安而且歎息，但仍然關心他們的職業和薪金更甚於關心抗戰。那個五十多歲的半聾的校長，一個從前在日本學工程

的，在教員休息室裏公開地說中國打不贏日本。但是，他接着補救幾句，中國還是不會亡。他說從歷史上看來，中國沒有滅亡過。當大家問他元代和清代算不算異民族統治，他才裝作沒有聽見，停止了牠的政論。而且我不喜歡我班上的許多學生那樣安靜，那樣老成。他們對於學校是有着許多意見的，然而他們卻很少正面地提出來。我甚至於有一次對快要畢業的那一班說：「我看你們比我還世故。」我希望他們多管一些事情，首先從學校裏管起。我並不是單責備他們，我沒有忘記文化的落後，軍閥官僚的統治，革命的低潮，職業和生活對於知識分子的威脅都幫助了某一部分人所施行的訓練，那種使年青人喪失了理想，熱情和勇敢的訓練。我只是希望能夠見到一種蓬勃的氣象，一種活躍。後來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我需要離開那個環境，我到底不是一個堅苦卓絕的戰鬪者。我自己還需要夥伴，需要鼓舞和撫慰。一個比較熱情的學生寫了一篇文章，慨歎着縣裏的人對於抗戰漠不關心，學校裏的一位主任勸他不要發表，並且說：「你責備別人，應該先從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請假回鄉下去作宣傳工作，而且不久以後，帶着一筆募捐來的錢回到了學校，這時候

那個主任對我說到他，就只輕輕的一句，「我看他有點神經病。」

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大一點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點事情。我教着書，寫着雜文，而且做一個小刊物的發行人。我和一個朋友每月上印刷所去校對；我幾十份幾十份地把它寄發到外縣去，送到許多書店裏去；我月底自己帶着摺子到處去算賬。我的文章抨擊到濃厚的讀經空氣，歧視婦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的殘餘，暗地進行着的麻醉年青人的腦子的工作，知識份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觀；但當我的筆碰觸到那個在北平參加「更生文化座談會」的周作人，卻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一個到希臘去考過古的人，他老早就勸我不要寫雜文，還是寫「正經的創作」，而且因為我不接受，他後來便嘲笑我將成爲一個青年運動家，社會運動家，在這時竟根據我那篇文章斷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連朋友在內，幾乎就沒有有一個贊同我的，不是說我刻薄，就是火氣過重。這使我感到異常寂寞，我寫了「成都，讓我把你搖醒」。像鼓勵自己似的，我說：

我像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

從黑暗的深處看見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來，

向我的國家走來……

這時，一個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個從前喜歡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卻在一篇文章裏取消了他對他的好感和敬意，說他願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漢奸，日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當他提到了我的時候，他說我不應該再稱呼自己爲一個個人主義者（一直到這時候我還間或又喜歡稱呼自己爲一個個人主義者，羅曼·羅蘭所辯護過的那種個人主義者），因爲我是有着我的夥伴的，不過在另外一個地方。

是的，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這樣可以減少一點我自己的慚愧，同時也可以使後方過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們思索一下，看他們會不會笑那些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兵士們也是頭腦暈眩或者火氣

過重。

我來到了延安。

我是想經過它到華北戰場去。我還不知道我自己需要從它受教育。我那時是那樣狂妄，當我坐着川陝公路上的汽車向這個年青人的聖城進發，我竟想到了倍納德·蕭離開蘇維埃聯邦時的一句話：「請你們容許我仍然保留批評的自由」。但到了這裏，我卻充滿了感動，充滿了印象，我想到應該接受批評的是我自己而不是這個進行着艱苦的偉大的改革的地方，我舉起我的手致敬，我寫了「我歌唱延安」。

現在，從華北戰場回來後，我已經在這裏住了十個月。在這裏，因為生活裏充滿了光明和快樂，時間像一只柔和的歌曲一樣過逝得容易而又迅速，而且我現在以我的工作來歌唱它，以我生活在這裏來作爲對於它的辯護，而不僅僅以文字。在這裏，當我帶着熱情和夢想談說着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人暗暗地嘲笑。在這裏，我這個思想遲鈍而且情感脆弱的人從環境，從人，從工作學習了許多許多，有了從

來不會有過的迅速的進步，完全告別了我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裏和其他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地規律地旋轉着，旋轉着。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裏面。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

論快樂

「我們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快樂的。」

當我這樣說時，一個同志提出了修正：「我們生活在延安的人應該是快樂的。」我們是不是還有着不快樂的同志呢？還是有的。一個寫小說的同志，一個快要到了中年的同志，有一天下午和我從抗大那個區域經過。看見許多人在活動着，像一羣金色的蜜蜂那樣生活得辛勤而且和諧，他歎息着對我說，「看見他們那樣的快活我真難過，我想，爲什麼我不能像他們一樣快活呢？」

但這顯然也帶着延安的特點：他在爲他的不快活而不快活。

他常常向我訴說過去的生活對於他的壓榨。當他訴說時，他彷彿在這樣逼問

我：「你看見過那善良的，灰色的，瘦瘦的驢子嗎？你看見過那有時因為馱載得過重，走的道路過長而突然跪了下來的小驢子嗎？」然而，也許由於我自己的船總是航行在平靜的河流裏面吧，我並不完全同情他。我在想，我們到底並不是驢子而是人。而且世界上有着因為生活的壓榨而變得脆弱，狹隘，絕望的人，也有着因之反而更強壯，更闊大，更勇敢的人。只是有一次，我卻完全為他所感動了，當他站在我的窰洞的門外，站在暮色裏，像一個舊俄羅斯的小說裏的人物那樣談說着他的家庭的零落，談說着他的抽鴉片的哥哥成天躺在牀上，他的姪兒們在完全沒有教育中長大了，快要被毀壞，他感到對他們有責任而又無力幫助。「我要想法把他們帶到這裏來，就是來當小鬼也好！」他的聲音並不高，但我聽着就像他在尖銳地叫喊一樣。

每一個人恐怕都有他個人的問題，個人的苦痛。從前在外面，當我和一個朋友談着這點見解，他用他家鄉的一句諺語來結束：「家家有一本難唸的經」。在這裏，我有一次輕率地猜想一個很年青的同志大概是很快樂的，他寫信來辯白，說了

一句很動人的話，就像是那些常常被人引用的有名的話，「每個人都有他的故事，而且多半是憂傷的。」

然而，我們生活在延安。我們的生活裏有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柱。我們知道我們活着是爲了什麼。正因爲我們認識了個人的幸福的位置，我們才更理解它的意義，也更容易獲得它。在明澈的理智之下，我們個人的問題和苦痛在開始消失，如同晨光中的露水，而過去的生活留給我們的陰影也在開始被忘記，如同昨夜的夢。

二

尼克拉梭夫有一篇長詩叫「在俄羅斯，誰是快樂而自由的」，雖說我還沒有讀到這篇詩，我曾經很喜歡這個題目，而且猜想它是一篇好詩。我猜想在一種充滿着哀愁的柔和的陰影裏面，有着各種不幸的可愛的人物從那詩裏走過，而且在暗暗地，一致地說着沙皇制度是最黑暗的制度。

舊俄羅斯的作者們總是很吸引我們。不管有的是鞭打，有的是控訴，有的是伸

出撫愛的手，有的軟弱到帶着歎息和眼淚，他們都是極其真實地寫出了當時的人，也就是極其真實地寫出了當時的社會。因爲人總是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下的人。詩人尼克拉梭夫還並不是那種有力的作者。最殘酷地寫出了當時的社會陰暗和當時的人的靈魂的陰暗的是杜斯退益夫斯基。我曾經很喜歡過他。那時我住在一個岩穴一樣的都市裏的小屋子裏，窗子掛着蘆葦簾子，不讓夏季的陽光進來。我的心裏也幾乎看不見一點光明。我在這樣一種雙重的陰影之下讀着他的作品。我能够從他那種沉重的壓得人不能夠呼吸的不快樂中感到一種奇異的快樂，一種被虐待，或者虐待人的快樂，一種被虐待後又馬上得到熱烈的擁抱和愛撫或者虐待人後又馬上投到他腳邊去哭泣的快樂。然而那不過是一種強烈的酒所能給與的興奮。當我從書本裏回到現實的生活，我總是更加憂鬱，更加陰沉。

在延安，有一個晚上我讀了他的「賭徒」。我發見我已經不喜歡他了。我異常明確地感到人間並不像他所寫的那樣可怕，而人的靈魂也並不那樣黑暗。由於讀了它，我更愛白天和陽光，更愛我所生活着的地方和我的工作。我更快活起來了。我

再也不想去重讀他那些厚厚的小說。

「從蘇聯回來」的作者紀德卻就不理解這點道理。在他那本出名的壞書裏面，他很驚訝在今日的蘇聯，在他所旅行着的蘇聯，杜斯退益夫斯基已經沒有了多少讀者。他甚至於懷疑這並不是由於人民自己的選擇，而是政府在加以某種禁止和限制。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國，在還正經歷着分娩的痛苦中的中國，杜斯退益夫斯基已經和我們隔得相當遼遠了。

三

在一次談「文藝工作者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座談會上，當大家結論到人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一個同志發言了：

「你們說的只是人的一方面，社會的人，還有人的另一方面，生物的人呢？」大家都笑了。

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在想着人的問題和苦痛除了由於社會來的而外，還有由於

人本身來的。

他不知道把人孤立起來看，離開了社會來看，所謂生物的人可以說並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地方。飢餓，畏懼寒冷，自然的衰老和死亡，性的要求，生育，從科學的觀點說來，它們本身都是合理的。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它們才成爲了問題。一個空想家可以去想像一種童話裏的人類，不吃東西，不睡覺，在空氣中飛行，或者像植物一樣傳延種族，然而我們不需要這種空想。我們還是就自然界和人類本身最大的可能性來改造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和我們自己吧！

我並不想在這裏來談論空想。我只要說明對於人的問題和苦痛的來源的認識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真理是很簡單的。不過在沒有找到它以前，我們可能老在它的旁邊繞着圈子，像迷失在一個很複雜的迷津裏面。許多過去的作者都經歷了，看見了人間的不幸，而且寫了出來，然而他們沒有找到那來源和解決方法，沒有找到那把最後的鑰匙，因此多半停滯在一種悲觀的思想。我們，感謝我們這時代吧，找尋我們的道路並不太困難。已經有着無數的人在爲真理而燃燒着，使它的光輝升得

很高，照得很遠。投身在它的光輝裏面，我們的心裏也就慢慢地充滿了光明。

四

爲什麼我要提出樂觀的重要呢？爲什麼我要做一個快樂的說教者呢？

如個別的人一樣，整個人類也負擔着「他」的過去的生活的重壓。那悲傷的，沉鬱的，絕望的舊世紀。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那黑夜。爲着更勇敢地迎接曙光，去開始新的一日的工作，我們所唱的歌應該是快活的，響亮的，陽光一樣明朗的調子。

這是很不同於無知的快樂和幼稚的歡欣的。這是由於充滿了信心和希望，而且從殘酷，艱辛和黑暗當中清楚地看見了美好的未來。

高爾基說列寧是那種明察的，有大智慧的，而且大智慧中有大悲苦的人。然而列寧有着那種由衷的笑，大聲的笑，單純的笑，健康的笑。一個沒有大的快樂的人是不會有那種笑的。那種笑聲現在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土裏面的人民們的歌聲：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或者「我們生來要把童話變成現實」。

而我們，現在還需要艱苦地而又快活地工作。艱苦地，而又快活地，這兩者並不衝突。因為工作將帶給我們以美好的未來，而在工作着的現在，它本身也給與着快樂。有名的頹廢派波德萊爾，一邊抽着鴉片，說着模糊的象徵的語言，也一邊宣言唯有工作才能够消除時間加於他的一種可怕的空洞之感的壓迫。契訶夫的戲劇裏的人物在自殺的槍聲未響以前，也常常無力地說着工作。然而那是無可奈何的，無目的的，孤獨的工作。因此也就是不快活的。我們的工作帶着積極的意義，知道爲了什麼，而且有着衆多的人參加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了。

論「土地之鹽」

一

舊俄羅斯有這樣一個對知識份子的稱呼：

「土地之鹽」。

我想，這恐怕只是在「到民間去」的民粹主義者們的時代裏流行過，而後來，知識份子經過了革命的考驗，歷史的考驗，這個說他們是人民的精華的比喻就慢慢地被忘記了。

現在我們說到知識份子，往往帶着一種不好的意味。

我聽見過一個知識份子的同志說：「我真討厭知識份子，所以我從來不寫他們。」他是寫小說的，已經寫了好幾本短篇小說。

我聽見又一個知識份子的同志說：「我真慚愧我也是一個知識份子。」他這句感歎的話的說出是當我在前線，當另外兩個剛離開學校的年青的同志在一次行軍中疏忽地丟失了行李。他參加部隊久一些。他彷彿不願意和他們共同有一個稱呼。

不過也有一個和工人接觸過的同志告訴我，工人同志們並不輕視知識份子，並不像知識份子那樣輕視知識份子。

二

知識本來是可珍貴的。有了知識本來是很好的事情。我讀過高爾基的一篇叫做「書籍」的文章，那簡直是一篇頌歌。他總是帶着深沉的感謝談起他的那些先生，從教他識字讀書的一個船上的廚子到修改他的作品的珂羅連科。十月革命剛過去以後，他總是那樣喜歡打電話麻煩列寧，請求釋放某個被捕的教授，或者為某個學者要屋子，要糧食。這個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這個自言「每一部書是一個梯子，使我從獸類爬到人類」的人，對於知識份子和文化的重視的態度是對的。

但這也是事實，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沒有獨立性的階層，是一個搖擺於舊的營壘與新的營壘之間的階層，是一個在某些關頭顯得軟弱無能，容易迷失，甚至於可恥的階層，所以高爾基又以一種詛咒的態度在小說中描畫了他們。

三

中國的知識份子更明顯地有一個不好的傳統，我想稱他爲「爬」的傳統。

這是一個有名的典故，然不妨重述一次：

梁實秋在韋勃士脫字典上查出了「無產階級」是一個「最低下的階級」之後，開始嚴肅地說道，「一個無產者假若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就是中國上層知識份子向上爬的人生觀的公開的表白。

四

比較起來，我們容易鄙棄古老的中國的一些朽腐的東西，而不覺察從歐洲的資本主義時期的思想（雖說對於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產物而言是有着進步的意義的）也帶給了我們一些需要再否定一次的不好的影響。

特別與知識份子有關係的一點是個人主義。
兒童似的自我中心主義。

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精神上負着十字架的基督。

總以為自己想得很深沉，迷失於一個自己虛構的迷津。

五

廢名在他的小說「橋」裏面寫那個男主角小林有一天忽然對那個女主角琴子說：

「昨夜我做了一個世俗的夢，醒來我悲哀得很……」

你看他說得多動人，多神祕，多深沉！但讀過這部小說，而且還讀得細心，而

且已經習慣了，理解了他那種含糊的寫法的人會知道小林這句話是指的什麼。就在前面一章，這個被寫得幾乎沒有人間煙火氣的人物和他的一個在塘邊洗衣服的嫂子發生了性的關係。

由於藝術家的直覺，或者由於一個人的實際生活的體驗，廢名不能自止地在那樣一個童話似的故事裏面插入了這樣一個現實的事件。然而他仍然躲避開了，沒有在這問題上多停留一會兒，沒有想通這道理。他不能肯定人的肉體的自然的要求。他不知道那不能用「世俗」這個字眼來輕輕抹去，那並不是夢，那也沒有什麼可悲哀。至於說對於他愛着的女子，小林做了一個不好的行爲，不忠實的行爲，那卻都是另外一個問題，作者並沒有觸到它。

六

我想寫出這樣一個公式：

單純——複雜——單純。

說得詳細一點：由原始的單純，通過應該有的複雜，達到新的圓滿的單純。這個公式對於思想，對於人，都是適用的。正確的道理總是明確而且簡單。經歷的鬭爭越多的人越是平易近人。

七

人製造着書籍，而書籍也在某種意義上製造着人。

我們的生活環境決定了我們所能接受的知識，而他們也反過來影響了我們。現在我們需要更多的有着正確的觀點的新的書籍。

現在我們需要對一切的知識投射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

一九四〇年十月

高爾基紀念

一

「但在我們餓着的時候，烤得壞的麵包也是——美味的。」在敘述了契訶夫的一些事情之後，高爾基這樣結束了他那篇回憶。他的那些回憶都是很動人的文章。契訶夫，這個有名的憂鬱的人，在白天的作家蒲寧的文章裏被放置在海和夜晚和靜寂之間，談說着死亡和幾乎沒有什麼希望的未來，在高爾基的回憶裏卻是一個充滿了熱愛和溫情的人。

從高爾基關於別人的敘述裏，我總是看見了他自己。

比如關於那個可憐地，或者說可怕地迷失了的安特列夫。讀過那篇回憶的人還記得那樣一個場面吧。像一個不能支持自己的崩潰着的人，安特列夫喝醉了酒，而

且跑到妓院裏去。高爾基還是陪伴着他，等待着他。那一定是很痛苦的。又比如關於托爾斯太。當他發見了這個他尊敬的人不過是一個偉大的孩子，他是多麼苦惱呵。又比如關於——你看，我竟忘記了他的名字，一個不大知名的烏克蘭作家。一個花一樣美麗的人。這樣的比喻，似乎並不是來自我的腦子而是來自高爾基那篇文章。他用着這樣的比喻，彷彿在歎息着美麗的花在大地上很容易找到，而美麗的人卻那樣希罕。

高爾基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他善良得幾乎使人想像他有些遲鈍。

二

他是一個新的階級的代表。他自己就是一個預言。他帶着粗率的強壯的姿勢走進當時的紳士作家之羣，是那樣地不和諧，那樣地震驚了舊俄羅斯（而且不久是整個舊世界）。他的勝利預言了無產階級的勝利。

因為他代表了新的階級，正在生長，壯大的階級，希望和未來都屬於它的階

級，他是健康的，樂觀的，有力的，帶着強烈的氣息的。

又因為這個新的階級，當時還埋壓在俄羅斯的舊社會裏面，猶如一個要分娩而未分娩的嬰兒，他的快樂是通過了痛苦的快樂，他的光明是通過了黑暗的光明。

「想起了未開化的俄國生活的這樣遲鈍的卑鄙，」他說，「我常常問我自己：這種事情值得寫嗎？我總以更新的確信回答我自己：這是值得寫的。爲什麼呢？因爲這是活着的卑鄙的現實：」

他寫了。舊俄羅斯從我們的眼前走了過去。而且在那卑鄙的現實裏，他也發現了而且寫了那藏在裏面的「明朗的健康的創造的東西」。所以這和他的另外一句話並不矛盾：「一個人若專愛去蒐集並且記錄人生的醜惡，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在幹着不好的事情的人。」

三

過去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在資產階級開始走向衰落和滅亡以後的文學作品，是

帶給了我們一些不好的影響的。自然，它們使我們的神經更敏感了一些，使我們更響往於那陰暗，那醜惡，那悲慘的反面。但它們很少能夠給我們以鼓舞和信心。我們已經厭倦了那種悲傷的氣息，舊世紀的氣息。我們需要着一些光明的故事，快活的故事，積極的勇敢的故事。然而我常聽見悲劇這樣一個字眼。甚至於有着不少自以爲是悲劇裏面的角色的人。

我在想：一個辯證唯物論者，對於悲劇的看法應該是怎樣的呢？悲劇的定義是不是這樣：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問題？而在一個辯證唯物論者的思想裏，是不是世界上還有着得不到合理的解決的問題？許多作者喜歡以死亡結束他們的故事。但死亡並不是一個悲劇，無論是自然的死亡，偶然的死亡，鬪爭中的死亡。

這或者就是我爲什麼特別喜歡讀高爾基的那些早期的作品的緣故。

四

當蘇聯正勝利地進行着社會主義的建設，高爾基回到了他的祖國，在廣大的歡

迎着他的人羣中間，他發出了一個異常簡單的演說：「一切都很好！」我們彷彿看見了他的感動，他的眼淚。他所獻身的事業在一個巨大的國土裏成功了。在那種成功裏，正如包含着另外許多戰士們的，長期的鬪爭一樣，也包含着他自己的那一份。他所做了的太多的工作使他成爲一個偉大的人。我想起了他自己話：「人是——世界的樞軸。」

他或者並不是指個別的人。

但就是個別的人，像高爾基這樣的個別的人，我們是應該在心裏給與他一個適當的位置的，如同地面給與一個罕有的高峯。

不但因爲我們的事業裏包含着他的已經完成了的個人的事業，不但因爲他是一個先驅者，而且，又是他自己的話，「想起這樣的人是好的」。因爲當我們懶惰的時候從他得到鞭策，當我們遭遇到困難的時候從他得到鼓舞和撫慰，當我們感到周圍的沉悶的時候從他呼吸着新鮮的曠野一樣的空气。而且，對於這樣的人，假若我們真有了理解，而且深深地爲他所感動過，我們會變得更好一些，我們的心靈上

會更減少了一些卑微，愚昧，污穢，狹小和自私自利。

饑 餓

我和一個朋友到少城公園去練習騎自行車。在那種太陽還沒有出來的夏天的早晨，街道靜靜的，兩旁的商店都還上着鋪板，像在睡早覺。當我們進了公園的門，走到那個大的運動場去，已經有人在騎着車兜圈子了，然而我們卻找不到那每天早晨租車子給我們，包我們學會的人。我們去早了一點。

我們到附近的一家茶館裏去，要了兩碗不放茶葉的白開水。成都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這樣早就有人坐在茶館裏了。這家茶館還附設一個射箭場，平常往那旁邊過，我總是看見有穿着道地的中式服裝的男子或者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站在那裏拉着弓，讓長長的箭飛到那有紅色靶子的木板上。我總是直覺地討厭這類地方，

這類人。現在還好，那場子上是寂靜的。我們坐在一個小而矮的茶几的兩旁，揭開了那平常擋茶葉的碗蓋，喝着水。

一個賣糖糕的小販從我們的茶座前走過。我叫他停了下來。我記起我們應該吃一點早點了。這種用大米麵蒸的糖糕，白色的，圓圓的而且蒸得頂上裂開了，在我縣城裏的小販們的口中被喊作「白糖碗糕」。當他們用一種清脆的甜的叫賣聲喊着從街上跑過，那曾經是怎樣誘惑過那時的小孩子的我呵。而現在我卻淡然地看着他用筷子把它們從洋鐵桶裏夾出，一個一個地送到我們桌上的仰翻着的碗蓋裏。

在這中間，一個糖糕掉了一小塊到地上去了。使我很驚訝的是剛好有一個小女孩子走過，她突然彎下腰去，從地上把它拾起來放進嘴裏，又很快地走過去了。

她瘦瘦的，不過十歲左右那樣，穿着一件洗得很舊，然而還相當清潔的淺藍色的布衣服，左手提着一個舊得顏色發黑的空空的竹籃子，她走得那樣快，而且沒有回頭望我們，彷彿羞澀於做了這樣一件事情。那一小塊白色的糖糕是很小很小的，比一顆米飯都大不了多少。

我彷彿第一次看見了飢餓，它以這樣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現，反而更使我感到顫慄。但是我又像看見了一個莊嚴的景象。我沉默着，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也沒有對我那個朋友說，雖然在平常我們是很喜歡爲一些無論大或小的問題爭吵的。

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這早晨的靜寂的白色的光輝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經窺見了你的——一個可怕的祕密。

二

又是少城公園附近，我和一個朋友坐在一家飯館的樓下的散座間吃午飯。在成都的那些小飯館裏吃飯，夏天總是有那種流浪在街頭的小孩子，穿着襤褸的衣服，拿着一把破蒲扇，突然跑進來站在你背後，用力給你打起扇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情我是感到非常難堪的，我拒絕了他們，然而那一頓飯還是吃得非常苦，總是感到他們的飢餓的眼睛盯在我的背上，而我吃着東西就像是做着什麼不可饒恕的壞事。

情一樣。過久了一點，我也就習慣於用一兩句話拒絕或者給一點錢，要他們走開，而且那種難堪的感覺也跟着就過去，能够欣賞菜的味道，吃得飽飽的了。人有時候就是這樣的。

這一次我們開頭又是這樣地遣開了那些野孩子。但在吃完了飯以後，我們從桌子的旁邊站起來，準備付錢，有三個那種小孩子突然跑來，猛烈地撲到我們的桌子前。我以爲他們是爲了爭搶。但當他們沒有遭遇阻攔地得到了他們所要的東西，他們都馬上安靜了下來，由一個歲數大一點的把小洋鐵桶裏的剩飯倒在那些有殘菜的盤子裏，用筷子拌了一會兒，然後分成平均的三份，大家開始吃起來。

「你們是弟兄嗎？」我問他們。

「不是，」那個我估計是哥哥的孩子回答。

我站着不走了。我想多知道一點他們的事情。我又問：

「你家裏是做什麼的？」

「我爸爸拉車子。」

「他不管你吃飯嗎？」

「他自己都還不够吃呢。」

很快地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坐着人力車到哪裏去，那個車夫在經過一家什麼店舖的時候突然把車子放下來，跑進去過了一會兒，然後出來再拉我走。我問他買什麼，他說他的大煙癮發了，去吞了幾顆煙泡。我想起了這個誠實的中年人，彷彿他就是這些孩子的父親。

我溫和地看着他們吃完這頓可憐的午餐，使他們一直沒有受到堂倌的打擾。當我走出那家飯館的門，我的心裏像被甚麼堵塞着，又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假若說那滿滿地堵塞着我的心的是一種還沒有變成眼淚的哭泣，那就不儘儘是悲慟着人間竟像是一座地獄，而更重要的是彷彿從那種卑微的不幸當中我得到了安慰，因為我看見了飢餓是怎樣把人們聯合起來，像親愛的兄弟們一樣。

在一個大學的教員宿舍裏，大家閒談着。一個到英國去過的人談着倫敦的劇院，談着沙士比亞的「李爾王」在舞台上出現的時候的那種人工的暴風雨。一個剛來到成都的朋友突然問我們到某條街去過沒有，我說沒有，而且不知道那條街爲什麼那樣重要。他似乎很驚訝我在成都住了半年連這一條街都不知道。他告訴我那是一條住着最下等的妓女的街，他已經去看過了，而且勸我們似地說，「應該去看看。」而且再加上一句，「我是天堂的生活也要去看看，地獄的生活也要去看看。」我突然記起了上面的那兩個小事件。我彷彿在想，要控訴人類的社會的不合理還不容易嗎？還要到處去找證據嗎？而且我不滿意於他只是什麼也要去看看。

我沒有把這些說出來，只是從此我就不喜歡那種穿着光亮的而且發出響聲的絲織品的衣服的人，不喜歡那些心安理得地講克羅采或者教希臘文的教授們，而且不滿意我的有些在文學上講究 *style* 和 *taste*，而上館子吃東西也老是選擇又選擇，覺得這樣不好吃那樣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們不應該太受責備，然而我那時是那樣過激，就像一個人發見了自己的弱點往往責備得過於苛刻那樣地，我寫着：「與

其做那樣的人我還不如去當洗衣匠，因為洗衣匠能夠把髒的衣服洗得雪白。」

四

完全是另外的時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

在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平漢路之前，我隨着一支軍隊停頓在一個小村子裏。我和一個在文學事業上是朋友，在革命事業上是同志的人住在一起。這個下午我們到附近的一個鎮子上去了回來，他一定要我們繞道經過旁邊那一片白楊樹林而不走那條直的大車路，他說他很想到那林子裏去走一走。

但當我們穿進了那些落盡了葉子，向明淨的冬天的天空直直地伸着它們的赤裸而且光滑的身體的白楊樹中間，在那凍結得硬硬的，沒有野草也沒有路徑的土地上慢慢地走着，他卻又不知道是嘲諷他自己嗎還是嘲諷我似地說：「你不欣賞這樣好的風景嗎？但是，我願意用這樣的好風景去換兩個燒餅。」

我對這樣一個同志也間或有一些小小的不滿。當他不願意吃那種陳舊的或者甚

至於帶着砂的小米煮出的飯和那種用水煮的又苦又酸的乾菜，而情願餓一頓，我總是照例地一句話也不說地在他面前把它們吃下去。

那時我更喜歡另外一個青年的同志，這個在北平的「一二九」運動中挨過到他們學校去逮捕人的警察的鞭打，也跟着遊行的隊伍去撞過北平的城門的人，有一次歎息着對我說：「中國人的平均的生活水準實在太低了，我們只應該取這樣的一份。」

我是那種並沒有經歷過那最本質地折磨着肉體和精神的飢餓的人，因此有時對於生活的貧窮和艱苦還帶着一種非無產階級的漠視的高傲態度，不像那個同志那樣樸素地暴露出他的弱點。其實他那時的願望，想用燒餅去代替小米飯的願望，不也就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並不奢侈的願望嗎？

在前方，生活是比較苦一些，但是我恐怕仍然不能說我已經深深地嘗味過了飢餓。有時過封鎖線而餓一夜一天，那總是疲乏掩蓋了飢餓，而且總是睡了一覺起來，部隊裏的小米飯就送到我們的炕上來了。我記得我們吃過的最壞的菜是那種完

全用青色的葱煮的湯，最難吃的飯是那種紫色的看着顏色不錯而放進嘴裏去像嚼着泥土一樣的高梁蒸的窩窩頭。這算得什麼呢？

五

我是一個多夢的人。羅曼·羅蘭說：「人的精神上有這樣大的對於幸福的渴望，當實際上沒有可享時，那就一定要想法來創造。」當創造也不可能時候，人有時就用夢來代替。而且我這並不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我是指那種在黑夜的睡覺裏出現的真正的夢。

夢其實也是一種生活和思想意識的反映。假若把我所有的夢分類一下，我就會發現有兩類新的夢是從前所沒有做過的。一種是政治性的，還有一種是飢餓性的。當我在前方騎馬把一只手臂摔得脫了臼，被醫生接好了而還需要放在綑帶裏修養的時候，我夢見了牛奶，我夢見在一個高大的，白色的，有嘴有柄的瑞典瓷罐子裏盛着滿滿的牛奶，而且我執着柄把它傾倒到杯子裏去的時候，它是濃濃的，冒着熱

氣，上面還浮着一層薄的油皮。然而還沒有開始喝它我就醒了。這一類的夢我是間或又做的，最近我又夢見我經過一間放着許多糕點的屋子，我竟至於不自禁地去拿一些來放進我的衣服的口袋裏，而且接着我又彷彿坐在一個筵席上，吃着許多盤美味的菜。這樣的關於飲食的夢，嘴饞的夢，是不是有人會笑呢？我想假若我的夢從那種比較特殊的，少數人才會有的夢漸漸地變得接近了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夢，貧窮者的夢，飢餓者的夢，那一點也沒有什麼可羞恥。在我們的隊伍裏，也許還有着那種天使一般帶着雪白的膀翅飛來的人吧，而我卻總是對於那些卑微的，帶着不美麗的苦難的烙印的，用粗糙的甚至於流着血的雙足從不平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人感到更親近，更像同母所生的弟兄，雖然我和這些一邊做着關於未來的黃金的夢，一邊忍受着當前的最平凡的飢餓和貧窮的人共命運的時間並不太久，而在過去，我長期地感覺到飢餓是那種另外的，比較起來不足道的，只能作為一種比喻的說法的飢餓——對於人間的愛的飢餓。

後記一

集名星火，並無旁的意思，不過是生命中飛濺出來的一點火花之簡略說法而已。

我民族大抗戰已經進行了七年多了。在這長長的時間中，個人的貢獻實在太微小。所寫的文章可以留存者不過這樣一本。另外，有的已經散失了，有的因爲自己太不滿意刪去了，有的又由於「自由太多」之故未能收入，但那數目也並不多，並不能用來辯護自己的寫作成績之差。從積極方面來說，慰情聊勝無，就名之曰星火。若從另一方面來着眼，對過去的思想感情加以嚴格的考察，則更適當的書名應該是知非集。也真曾經想到過這個名字。不用說，這是想起了古來有個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年紀雖還沒有蘧老先生那樣大，思想上卻也經歷了不少的變遷。遠的不提，單

說抗戰以來，有這本書爲證，也就走了一個大之字路。什麼時候才能好好地吧這段經歷寫出來呵。在這次，是只能給這些散篇文章穿一根線似地，極其簡略地作個概括的敘述了。

七年以前。廣大人民所要求的抗日戰爭終於展開了。每一個忠實的民族兒女都感到了興奮和責任。這集子裏的第一輯是我一九三八年在成都所寫的雜文的一部份。從它也就可以看出一個初上戰場的新兵的激動。然而當時並不懂得如何團結各種可以團結的社會力量，尤其不懂得如何投身實際鬥爭中去深入羣衆，改造自己，因之在一個小圈子裏很快就感到了孤立。成了這樣一個打了敗仗的個人主義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枝苦戰了十餘年的大軍。這決心還帶着一種寫作上的企圖。我當時打算專心寫報告。

我是這樣到延安去的。帶着一腦子原有的思想與個人的願望。因此，在「我唱歌延安」中我所感動的歌唱的乃不過是它的自由，寬大和快樂。對於一個從舊世界

來的受够了壓抑的知識青年，這的確已經够多了，够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些更本質的東西我當時還是不大理解的。我那篇報告就沒有着眼於那種翻天覆地的大變動：在那裏曾經是奴隸的勞動人民已經作了主人。更進一步的問題，我的思想情感與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還有很大的分歧，這分歧只有經過否定舊我，經過長期的理論上學習與行動上實踐來解決，在當時更是感都沒有感到的。

然而潛伏着的問題總會暴露出來。那是到前方去了以後。開頭我熱心地去搜集材料，去進行訪問。但把這樣得來的材料寫成了文章自己也不滿意的時候，對於寫報告我就有些動搖了。後來也想到這是由於坐在師部作客之故，就參加了工作。但這也不過是形式上的變換而已，雖說從師部搬到了政治部，仍然是帶着作客的心。不去參加下級部隊生活與戰鬥行動，不去與那些民運工作人員一起到敵我爭奪的區域跑，經常與老百姓打交道，只是呆在政治部裏和幾個同時上前方的知識分子天天在一起，那裏能接觸真正的戰鬥生活呢。這樣，舊的情感就越來越抬頭了。掛包裏的日記本上也從客觀材料的記錄變爲了個人情緒與感想的抒寫。這不僅僅是寫作的

失敗。更嚴重的乃是走進新的軍隊，人民的軍隊中去了，但並不能和他們打成一片。最後，竟感到我在前方是一個沒有用處的人。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回到了延安。這是一個可羞的退卻。這是畏難而退。在這集子裏的第二輯中的報告實際只有一篇是在前方寫的。其餘關於華北人民與軍隊的報導，都是回到了延安，翻開材料簿，硬把它們寫出來的。這自然更成了強弩之末，寫得難免興味索然了。除了內容上不是深入生活的結果這種最根本的缺點而外，在寫法上，這些報告也有問題存在着。很顯然地外國作者的作品對我當時的寫作有着支配的影響。耍花樣的形式主義傾向越來越顯露了出來。其實所謂報告也者，現在想來，不過是記事文之一種而已。爲什麼不老老實實地當作記事文來寫。而心目中卻總以爲像基希，愛倫堡等人寫的那樣的東西才是報告呢？這真是沒有出息的教條主義。

回到延安後，這一段上前方的經驗是應該嚴肅而深刻地檢討一下的。因爲凡是

失敗與偏向，若能給以理論的總結與思想上的解決，那是一種很好的活的教育。而這次上前方剛好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的過程中所必然會碰到的問題：到工農兵中間去了然而並不能與他們打成一片，從思想情感到語言都和他們有着很大的距離。當這距離出現的時候，積極的解決辦法應當是堅決地拋棄自己過去那一套，重新學習，鍛鍊，做一個新的人。但是，假若思想上沒有準備，那就往往會畏難而退，用各種形式來保存舊我。而我當時就走了後面這條路。回到了延安，自己也未能正視這失敗，追根到底地思索這失敗，反而更加肯定了這種消極的退卻的路線。不認識這是一個自我改造的問題，只以為是一個寫作上的問題。因之就得到了過分強調寫熟悉的題材的文藝見解。

寫熟悉的題材，這本來是一個寫作上的規律。但等到我把它加以片面的誇張，加以引伸為達到「知識分子作者最好就寫知識分子」的主張，則不但否定了反映新的人（工農兵與其幹部）與新的現實（這是他們所創造出來的）的重要，而且成爲了一種拒絕深入羣衆，改造自己的護身符。這和我自己在抗戰初期所宣言的文學不

能脫離「爲這民族的自由而戰鬥，而死傷，而受着苦難的羣衆」（「論工作」）的主張對照起來，顯然是一種倒退了。這也說明，正確的信念假若不經過實踐去鞏固，去充實，去戰勝了重重困難而終於堅持下去並且得到發展，那就往往會成爲空洞的口頭上的教條，或者甚至於在理論上也會拋棄了它。

第三輯的幾篇文章就是這個階段的產物。要較清楚地瞭解我當時的寫作傾向，那是應該和我的詩集「夜歌」放在一起來看的。有些特點，是在這個時期的詩與文中都共同表現了出來的：

一、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代替或者附會無產階級的觀點。「高爾基紀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那篇短文中，我以頗爲抒情的筆調講了高爾基的善良，樂觀，與從他可以得鼓勵。其實高爾基的主要精神哪裏在這些地方呢。他的偉大之所在倒是羅曼·羅蘭的那篇「向高爾基致敬」說得好，在於他的事業是與下層民衆緊緊地相結合着的。還有，「飢餓」也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這是一篇我自己覺得還寫得動人的文章，意思也是好的，但是我的飢餓的夢的內容乃是牛奶，糕點，筵席，

這是何等本質地說明了我與勞苦人民還是同夢而又不同夢呵。

二、從個人出發的思想情感之反覆談論。快樂呀，過去呀，私人問題要善於處理呀，等等，這些都說明了最經常，最根深蒂固地佔據着我當時的腦子的還不是憂國憂民，而是憂己憂私。在「論土地之鹽」中我企圖論列這問題。然而那是何等不澈底，何等消極。我記得我當時最主要的意思是希望知識分子善於處理私人問題，少起「麻煩作用」而已。

三、在思想方法上，抽象地看問題。比如抽象的「人」的觀點。第一輯中的「論本位文化」即強調所謂個人觀念的重要。其實所謂文藝復興的「人的覺醒」，實際上不過反映當時市民階級的興趣而已，廣大的勞苦人民又何嘗從此就得到了解放。在「高爾基紀念」裏我又引用了「人——是世界的樞軸」這句話。這一句偶然的文學的說法，爲什麼特別打進了我的腦子，而且加以含糊地引用呢？這不過因爲它適合於自己的抽象的「人」的觀念而已。用科學的觀點來攷察，事實上過去和現在都並不是一切人都是世界的樞軸。誠然，大多數勞動者創造了世界與歷史。但也

有一部分人是敗類，是吸血者，是暴君，是在毀壞着世界。因此我們說社會發展的歷史是勞動者的歷史。因此作爲世界的樞軸者並不是一切人，並不是抽象的人。

這些，僅是抽取一部分要點來說而已。在當時，從文藝見解到對於各種問題的看法大體上自有一套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與方法，自成一個系統。這種立場與方法，這種系統，當然是和客觀真理與廣大人民的利益並不符合的。這是由於出身，生活，教育（對於我，尤其是過去文學作品的影響）所構成。

這個時期，所寫的文章也不止這幾篇。有的是有意刪去了的，比如「給艾青先生的的一封信」。那也顯露出來了我當時那種頑固地留戀舊我的壞習氣。對於過去，沒有嚴格的批判而只是辯護。這缺點，就是在留存下來的「一個平常的故事」裏也有的。但還是把它留存者，是因爲儘管還未能以一種更客觀的精神來敘述，也可以部分地窺見我到延安去以前的思想變遷。

還有兩篇刪去了的文章也應該提一下。一篇是「怎樣研究文學」。這篇文章並不能幫助初學寫作者解決問題。其中關於才能問題的提出，曾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批

評。其實不但這一點，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和其他許多觀點都是不妥當的。另一篇是「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好在我在整風後寫的一些文藝論文中的論點剛好批判了這篇論文裏的見解，因此關於它的錯誤就不必細說了。

上面所提到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我是在一個偉大的整風運動起來以後才逐漸認識其錯誤，並逐漸從破壞舊的思想到開始建立新的。我偉大民族應該有偉大的思想家產生。毛澤東同志，正是斯大林論述列寧時所說的那種革命領袖，「一身兼具着雄厚理論力量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工作與組織工作的經驗」。他的整頓三風報告，概括了革命歷史上的問題，也概括了當前廣大的革命隊伍中存在着的思想病症。這是以無產階級思想來改造小資產階級思想。這是以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來改造唯心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是他的思想在文藝問題上的具體運用與發揮。這些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樣，都是從客觀實際中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定論。他的理論的偉大指南作用，過去的歷史證明過，現在

的事實在證明着，未來也一定將繼續證明它。

經過了這種思想改造的烈火的洗禮，我的眼睛也才比較明亮了一點。然而，這並不是說在這個運動過程中及以後所寫的文章，就沒有缺點或錯誤。客觀事物是極其複雜曲折的，我們的主觀論斷不易和它們的規律完全吻合。而且正確的立場與方法之比較完全的獲得，掌握，也並不容易，還需要長期地學習，鍛鍊。只是在基本精神上自覺這些文章和過去是有些不同了。就把這些談論問題的文章編爲這集子的最後一輯。

「論對待文學的態度」是一篇總結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的偏向與經驗的論文中的一節。因爲其他數節現在看來已沒有多大意義了，客觀實際的發展與進步已超過了我當時的意見，就只選存了這一節。

「兩種不同的道路」是爲了紀念魯迅先生臨時趕寫的，並不是什麼經過了平日的研究之作。由於材料的缺乏（特別是周作人早期的作品當時找到的很少）與研究的不够，恐怕其中沒有什麼新意見。然而還是留存者，因爲這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表

示我對於這位偉大的「精神界之戰士」的敬意。

最後兩篇是今年到重慶來後寫的。

第四輯都是一些關於文藝方面的文章。在這些篇中，自覺尙或多或少地提出了一些問題。由於學力不足，加之不敢十分自信，許多提出的問題就未能充分發揮。是否也有足取之處，或者哪些地方應該被糾正，都很希望能得到讀者們和文藝界的先進們，朋友們的批評和意見。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於重慶

後記二

這個集子的第一版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由羣益出版社在重慶印行的。那時出版社震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審查制度的餘威，把其中「我歌唱延安」和「論對待文學的態度」兩篇自動抽掉了，而且「××」很多，篇次和字句都有些錯亂，讀來令人不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羣益出版社在上海又就原來的紙版再印了一次，抽掉的文章和錯亂的地方仍未能補正。這次三版，才重新編校了一次。必須說明的，是這次把原來的第四輯關於文藝方面的文章全部抽出了，準備編入一個文藝論文集子裏；而一九四四年以後在重慶所寫的雜文則另編為「星火集續編」。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於北平